

还“四人帮”以老右派 的本来面目

山东省革委文化局
创作办公室

4
1977

《文艺学习资料》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王洪文则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所谓“四人帮”，就是由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
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
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42) 朱新 著

目 录

- 三月的租界……………鲁迅 (1)
鲁迅批判张春桥之流的言论选辑…………… (4)

批 判 张 春 桥

揭开狄克们的反革命嘴脸

- 重读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石冶弓 (11)
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 (18)
从《俺们的春天》看张春桥的反动嘴脸……………文汾平 (22)
张春桥是蒋介石的吹鼓手……………卫 今 (26)
一个日本走狗的供状……………
(88)——评张春桥的反动文章《济南》……………
(28)……………山东大学大批判组 (31)
一个老反革命的自供状……………八一武念研
(78)——评张春桥三十年代中期的黑作品……………
(30)……………吉林省图书馆大批判组 (37)

批 判 江 青

-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鲁迅研究室 (44)
从争演赛金花到为蒋介石祝寿……………
——揭开老投降派江青的真面目……………
……………文物出版社批判组 (49)

最无耻的汉奸理论

——斥江青一九三七年的黑文《三八妇女节》

.....立军 泽清 (54)

目 录

批判姚文元

姚文元是个尊孔派.....邢福石 (57)

褫其华衮 示人本相

——评姚文元的尊孔言论及其它

.....柯文平 (61)

附 录

张春桥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俺们的春天..... (69)

济 南..... (72)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80)

张春桥向鲁迅反扑的信..... (83)

也是文学管见..... (85)

纪念九一八..... (86)

韩复榘..... (87)

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 (93)

坚持工农兵方向..... (101)

把根扎深一些..... (108)

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 (116)

张春桥其它文章中的反动言论摘录..... (125)

江青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演员独白（节录）·····	(132)
为自由而战牺牲·····	(133)
三八妇女节·····	(135)
“四十年代”与“业余剧人”争演赛金花纠纷的经过	
“业余”招待记者解释一切·····	(137)
么哥：见闻偶记——蓝苹将演赛金花·····	(139)
蓝苹一九三六年参加为蒋介石“购机祝寿”演出的情况（资料）·····	(140)
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漫谈“同”与“异”·····	(141)
一点补充·····	(144)
教条和原则（之二）·····	(150)
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153)
姚文元其它文章中的反动言论分类摘录	
（共十一类）·····	(155)
蒋帮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所载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170)

三 月 的 租 界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注：即张春桥）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

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

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见《且介亭杂文末编》）

三式一）《‘美’的‘美出’》（杂文末编卷个且）

（日十三民四零六）

事公而，不一息有愿半半。下位效早，前日二十民四
前例表，并膏歇不，息突歇不，无天障言，类生产困，事好
越不代产香苑，代产好景总出，下该是冀总录。事夫工好出
效日也。击茂采前座不味印英。来强社出书好；事紫诗血
而，入赋言好，平前干登非，学文调国制，会树案非在森里
罪前英帝宣王会集亦至甚，行大案国社烟代出好味印英

鲁迅批判张春桥之流 的言论选辑

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公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话是不错的。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的受批评家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注：这是张春桥《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中的意思），“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然而别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脸了，他戟指大叫道：“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惭愧得很，实在没有。不过其实也不必这么激昂，因为从地壳凝结，渐有生物以至现在，在俄国和德国，托尔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个。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

四月十一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签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却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

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注：即《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致王治秋信》（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

我们的学者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近如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

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辨，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报复之意云尔。

《致郑振铎信》(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漫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在

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

（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

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

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1）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

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一九三六年

夏）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一九三六年

夏）

敌国的田汉君被捕后又释放了，现在正为南京政府（当然，同时也为了艺术）而活动。这样虽也自由，不过据说在田君身上随时都围绕着正义与真理，这却又有些想不通了。

《致日本一作家信》（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

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致肖军、肖红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

日）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事。但

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致肖军、肖红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致肖军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海之所谓作家，鬼域多得很，……但是“作家”之变幻无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致杨霁云信》（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夏）

（日）

（日）

揭开狄克们的反革命嘴脸

——重读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

鲁迅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挥笔奋战，真是“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藁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在那“毕现”的形形色色泉蛇鬼怪的嘴脸堆里，我们也见识了一副“狄克先生”的嘴脸：分明是扑人、咬人的叭儿狗，却扮着“公允”、“平正”的猫相；分明是一个跳梁小丑和投降派，却涂着“左翼”、“激进”的雪花膏。鲁迅以厌恶、愤慨的心情，写下了《三月的租界》这篇犀利的杂文，对狄克的丑行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鲁迅对狄克的批判，是有着重要典型意义的战斗。狄克是何许人也？不是别人，就是当前全国军民愤怒声讨的“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里的那个张春桥。今天，重温鲁迅《三月的租界》这篇著作，对于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识别那些钻进革命营垒里的“蛀虫”，识别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现在的狄克们，实在是益莫大焉！

狄克跳出来露脸的年代，是一九三六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全境已经四年多，并逐步侵入我华北地区。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顽固实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卖国

政策。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英雄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彻底批判了统治全党四年之久，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位青年作者从“荆天棘地”的东北回到“祖国”，出版了一本描写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事迹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热情称赞这部作品，为它写了序，指出这部作品的政治意义是“有碍”于侵略者的“心的征服”。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保护青年、扶植新生事物的态度，是何等鲜明啊！然而，这却引起了狄克这个“不平家”的不平。

请看，狄克摆出一副“激进”的“革命”的“指导家”的架式，在一张反动文人编辑的《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短评，对《八月的乡村》夹枪带棒，滥加指摘：什么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小说“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呀，如此等等。鲁迅十分辛辣地驳斥狄克：“如果是做随员”，“如果是剿匪”，因而回到“祖国”，他们是连个屁都不会放的；但是跑到上海出版了一本宣传抗日的书，他们竟要拒之于千里之外；并且“叽里咕噜”呀，群起而打之”。可是，狄克还假惺惺地声称：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所以才“要执行自我批判”。鲁迅严正回击道：“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如果在还有‘我们’和

‘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这段话，多么切中要害！忘记了“我们”之外的“他们”，不就是抹杀了阶级界限，取消了阶级斗争吗？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不就是狄克们大搞分裂，削弱革命队伍吗？这只能使敌人称快，朋友寒心。在鲁迅的深刻剖析下，狄克及其一帮在革命营垒内部闹宗派，向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献媚、投降，把“纳款、通敌的鬼域行为”当作“‘前进’的光明事业”的反动嘴脸，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了。

狄克这个“破落户的漂零子弟”，反动的阶级本性根本没有得到改造，鬼混在“三月的租界”里，倒出落成了“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专搞阴谋诡计的里手。他那篇奇文堂而皇之地在文前引用了一段斯大林的语录，在“自我批判”的幌子下，恣意挥舞大棒，否定《八月的乡村》的战斗作用。那用心实际是：若拿不出“坦克车和烧夷弹”，就该“折断了投枪”，妄图扼杀新生的进步文艺，缴掉文艺新军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的武器。更有甚者，狄克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教养”年青的作家，而险恶的居心却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他污蔑鲁迅使作家“和批评家对立起来了”。挑拨是非，嫁祸于人。鲁迅明明在序文中批评了《八月的乡村》“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均有不足之处，他却闭着眼睛责怪鲁迅没有指出小说的缺点，“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多么耸人听闻的罪名！正如鲁迅后来所痛斥的：“他们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真是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

狄克们为什么要“嗡嗡营营”，打击、围攻和迫害鲁迅

呢？众所周知：鲁迅在一九三六年春天，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针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明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这充分表明了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而狄克，正是在王明一伙的驱遣下，摇旗呐喊的叭儿和打手。在那篇奇文里，狄克不是公开叫嚣着“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结成联合战线”，向着鲁迅张牙舞爪吗？鲁迅对他们的反击，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狄克及其一帮原来是些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投降派，是“国防文学”的狂热鼓吹者和积极实践者。鲁迅一针见血地点明“国防文学”之类“最中心之主题”，就是投降卖国，恰如《赛金花》一剧把一个汉奸妓女美化成“九天护国娘娘”那样，简直臭不可闻。鲁迅满怀革命豪情地写道：“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他对狄克们及其后台鼓吹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又招降纳叛、藏污纳垢的所谓“联合战线”，嗤之以鼻，痛斥他们“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鲁迅以韧性的战斗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予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以致命的打击。斗争愈深入，愈证明鲁迅所揭露的狄克们，是分裂瓦解革命队伍，向敌人“献媚”，替敌人“缴械”，大搞投降主义的蠢贼。

用鲁迅的话来讲，那帮狄克们乃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潜入的“投机者”，“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三翻四复的暗探”，“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鲁迅对于这帮坏蛋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现在，到了把狄克的反革命嘴脸揭开来示众的时候了。认清狄克的反革命嘴脸，可以有助于我们认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夺权的狰狞面目。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英明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必须懂得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资产阶级，来自正在走的走资派。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是认清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的重要标志，是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党内的资产阶级、正在走的走资派，就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这些人都有着鲁迅所揭破过的狄克们的嘴脸。张春桥正是摇身一变，掩盖起肮脏的历史，伪装得比谁都“革命”，混充“正确路线的代表”，在革命队伍里深深潜伏下来的老投降派。王、张、江、姚“四人帮”虽然窃踞了一些党政要职，成天称王称霸，作威作福，但是手中没有真理，周围没有群众，积怨甚多，人心丧尽，内心惶惑空虚得很。这样的人，怎么能干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呢？他们只能靠“嗡嗡营营”，结帮营私，

玩弄权术，吓唬人，来延续他们那“空壳”般的生命。历史注定他们是短命的。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胆大包天地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并经常用“红纸包着烂肉”的手法，以售其修正主义之奸。他们害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热衷于拉山头，搞行帮，自成体系，结成反党集团。他们“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他们只谙于搞鬼蜮伎俩，秘密串连，阴谋策划，到处寻找缺口，制造混乱，以便从中渔利。他们喷毒汁，放暗箭，告人黑状，整人黑材料，对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鲁迅当年不就被狄克及其一伙扣上了什么“破坏统一战线”、“反革命”、“托派”、“汉奸”、“买办意识”等千奇百怪的“帽子”吗？王、张、江、姚“四人帮”才真是“得志更猖狂”，利用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帽子”满天飞，打击、陷害革命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帮兴妖作怪，彻底违背“三要三不要”原则的阴谋家、野心家，扯破嗓门地嚷着“反复辟”、“反倒退”，而他们正是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的罪魁祸首。如果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我们的人民就会重新沦入血雨腥风的苦难深渊。这些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已闹得风云激怒，山河共愤，亿万军民莫不对他们恨之入骨，痛斥之声载道盈野。他们的失败、覆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代表着最腐朽的剥削阶级，已经无可救药了。随着这帮恶贯满盈的“蛀虫”的被清除，我们的革命队伍将更加团结坚强，

形势将好上加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更加蓬勃发展。

我们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读点鲁迅”。我们要以鲁迅为光辉榜样，“不克服敌，战则不止”。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的王、张、江、姚反党阴谋集团斗争到底。让我们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发扬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驰而不息”，“永远进击”。

（原载1976年10月22日《解放军报》）

（原载1976年10月22日《解放军报》）

（原载1976年10月22日《解放军报》）

（原载1976年10月22日《解放军报》）

（原载1976年10月22日《解放军报》）

（原载1976年10月22日《解放军报》）

（原载1976年10月22日《解放军报》）

（原载1976年10月22日《解放军报》）

（原载1976年10月22日《解放军报》）

。周文穆蓋能更濟业運命革器簡氣天一我財士我排裝組
照蓋要，中斷高而由者善派主手麻半其既區在學空印海
一收不”，新海戰決伏出魯以要印發。“丑魯為對”示洪的亂注手
機本基的堂詩

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

。又注既區 遇普圖，命革變兼前不難空送簡氣天制型，裝
團圖，際衣圖，又 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組 巧莫，慰恩永碧子
筆半因象集團堂司滅，耳，新，王臨對空賞藝團空，什新射
團央十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鲁迅《三月的租界》，并且发表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的文章，揭露了一个四十年前化名“狄克”，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卖命的人参加围攻鲁迅的卑劣行径。这个“狄克”不是别人，就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这个老投降派、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原形，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地暴露在人民面前了。

就是这个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竭力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充当“围剿”鲁迅的急先锋，充当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一条叭儿狗。他在反动的《大晚报》上，化名“狄克”，抛出黑文章，攻击鲁迅“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其目的就是要挟鲁迅向他们的“国防文学底路线”屈服，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屈服。鲁迅立即写了《三月的租界》，严正地指出：“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一刀就戳穿了张春桥的“革命”、“正确”、“公正”的画皮，暴露了他的投降派的丑恶嘴脸。

张春桥利用他钻在革命营垒内部的特殊身分和特殊条件，当《三月的租界》还没有发表，就在一家书店看到了这

篇稿件。鲁迅的杂文，击中了这个投降派的要害，使他“心里不安好几天”。但他毫无悔改之心，“经过几天的思索”，又向鲁迅进行一次猖狂反扑。他给鲁迅寄出了一封黑信。他针对鲁迅说的“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恶狠狠地攻击说：“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制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他呢？”这条叭儿狗以为后台很硬，有恃无恐，公然叫嚷：“对于‘田军不该早回来’这句话，我并不是盲从”，可见张春桥是多么自觉地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卖命，完全是一副忠实走狗的丑态。鲁迅用《三月的租界》作标题，也大大刺痛这个躲在租界上指手画脚的“洋场恶少”，他在信里就猖獗地指责“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什么“大家”，说穿了就是伤了他们一伙的反革命感情。于是，这个张春桥便雄赳赳地打上门去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鲁迅在日记里记下了一笔：“得狄克信”。这是写完《三月的租界》的第十二天。张春桥这条被鲁迅亲自打落水里的叭儿狗，妄图爬上岸来继续作恶。对于张春桥的反扑，鲁迅又以打落水狗的精神，给以痛击。张春桥在信里惶惶不安地表示：“只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心”。但在以后的《鲁迅日记》里，没有记载复信的事。鲁迅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可以想见，鲁迅是以极大的轻蔑对待这封黑信的。

然而，鲁迅特别把这封黑信保存下来了，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张春桥这个老投降派四十年前一份重要的罪证。我们知道，鲁迅有一个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有些故事，也往

往留起来。”而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法西斯的“瓜蔓抄”，鲁迅曾几次将朋友的来信完全烧掉。鲁迅特别把这个“狄克”及其同伙的一批信件保留下来，显然是为着将来的斗争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鲁迅在四月三十日作的另一篇反击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杂文中，即在《三月的租界》的姊妹篇《〈出关〉的“关”》中，回敬了张春桥的反扑。鲁迅指出：“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鲁迅把张春桥这条想爬上岸来的落水狗，顺手一击，重新打落水里。

四十年前，张春桥之流是寄身于“三月的租界”里的“洋场恶少”，他们所擅长的是“故作激烈的空谈”，是“纸张上的革命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他们“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混进革命营垒里的“蛀虫”。就是这个“狄克”，长时期来隐瞒历史，欺世盗名，伪装“左派”，爬上高位，成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鲁迅对张春桥丑恶面目的揭露，大大帮助我们认清“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特征、本质和阶级基础。他们仍然是“拉大旗作为虎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歪曲事实，颠倒是非，

制造谣言，欺骗群众；他们仍然是结成黑帮，自成体系，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大搞阴谋诡计，大搞分裂活动，大开“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多年来“四人帮”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以致人心丧尽，极端孤立，一被打倒，普天同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曾经用革命人民斗争的鲜血所总结的经验写下了痛打落水狗的至理名言，鲁迅打退张春桥反扑的经验，今天读来，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

让我们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精神，象鲁迅那样永远进击！

——（原载1976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从《俺们的春天》 看张春桥的反动嘴脸

文 汾 平

老投降派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写过一首黑诗《俺们的春天》。这篇署名张春桥的白话诗，是一棵污蔑城市产业工人形象的大毒草。它发表在《文学季刊》第四号上；发表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距离中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历史舞台的五四运动，已经十五年，距离我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已经十三年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十多年中，中国工人特别是城市产业工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斗争中，例如，从“二七”到“五卅”，从海员罢工到上海大罢工……城市产业工人都是挺身而出，一马当先，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城市产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战斗，已经由进行自发斗争的群众，锻炼成为一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坚强队伍，成为“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力量。可是，张春桥在他的黑诗《俺们的春天》中，又是怎样描写这个最先进的阶级的呢？在这首五十四行的黑诗中，张春桥把城市产业工人歪曲成为完全消极、毫无作为的群氓。他们

是一群浑身充满“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既不进行斗争，也根本没想到要斗争。他们心甘情愿地、默默地忍受着被剥削被奴役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张春桥挖空心思，丑化产业工人，说他们象只死去的“野狗”、“象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刚刚下去一群，群一群又上来，象件死了的机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国工人阶级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教导下，早已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并且已经进行了整整七年以上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光辉胜利。可是，张春桥在这首黑诗中，却把早已拥有自己强大革命武装力量的中国工人阶级，描写成“象一排犯人样走着”的、“只能挥着黑的拳头”的“黑鬼”！

不能忘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正是震撼世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以后的三个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团结抗日的响亮口号，宣布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纲领，为全国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可是，张春桥在这首黑诗中，描写最有觉悟的城市产业工人所希望的“春天”，却不是全国人民和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而只是“哪个女工漂亮”。按照张春桥下流无耻的逻辑，这是因为“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好一个“活灵灵的人”！照张春桥看来，“活灵灵的人”所要求的“春天”，无非就是得到一个漂亮女人。

张春桥为什么要如此颠倒黑白，向经历了长期英勇斗争的我国产业工人脸上抹黑，而且黑到不能再黑的程度？鲁迅先生说得好：“工农都象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

的”。张春桥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力图向人们宣告：中国工人阶级“象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是毫无政治觉悟和政治要求，毫无反抗斗争精神的群氓。因而，这个阶级根本不配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领导力量。张春桥通过这首黑诗，妄图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他这个反革命观点，正和包括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动派的观点完全一致。这就充分表现出他这个混在革命阵营内咒骂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嘴脸。

张春桥为什么要把早已在政治上觉醒了的工人群众，歪曲、丑化成为甘受奴役、麻木不仁、只知“叫春”的猫儿呢？为什么要把“俺们的春天”——工人群众“希望”中的“满树的春花齐开”，归结为女人和楼上的歌声呢？他无非是要工人群众忍受剥削奴役，安分守己，追求女人，从而涣散斗争意志，取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当红军在长征途中奋勇前进的时刻，张春桥就这样通过他的下流黑诗在喊话，要工人群众放弃斗争，缴械投降。从张春桥的这首黑诗，可以看出当时以“左翼作家”面目出现的这个文痞，是如何积极卖身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

鲁迅先生在《三月的租界》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春桥在《八月的乡村》问题上大做文章，“其实是在向‘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俺们的春天》这首黑诗，正好为鲁迅先生的话作了极其生动、具体的注解。

从一九三四年写黑诗《俺们的春天》，到一九三六年受鲁迅批判，可以看到这个以舞文弄墨为手段的家伙，他背叛工人阶级，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充当反革命帮凶，为他们

做“缴械”工作，其罪恶行径是一贯的，连续不断的。这么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到了七十年代，背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最革命的词句掩饰下搞资本主义复辟，成为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是有其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包括张春桥在内的“四人帮”反党集团，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饰他们最卑劣无耻、凶狠恶毒的复辟倒退阴谋，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对“四人帮”采取了果断措施，粉碎了他们罪恶的复辟阴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受到全国上下热烈欢呼，一致拥护。现在，“四人帮”的罪恶大白于天下，这个向来巧言伪饰，乔装打扮，自封“左派”的张春桥，不管他如何老奸巨猾，如何善于隐藏，也终究掩盖不了他是个老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原载1976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张春桥是蒋介石的吹鼓手

卫重山今

张春桥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在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丁玲、舒群主编）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反动文章《韩复榘》。张春桥以前一直以文艺界人士的面貌出现，这篇《韩复榘》谈的却不是文艺，完全是一篇政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本不顾毛主席当时已经发出的“**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严厉警告，极力吹捧国民党反动派总头子蒋介石，公然鼓吹向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投降。读一读这篇文章，很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眼界，进一步看清张春桥这个惯于伪装“左派”、摇唇鼓舌、欺世盗名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说明他早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右派。

文章发表在一九三八年春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时候，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同仇敌忾，奋起抗战。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政策，阴谋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并消灭共产党。适应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政治需要，在党内，出现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在延安，在武汉，到处发宣言、写文章、作讲演，公然鼓吹：“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承认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领袖”，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的口号，叫嚷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在一个

统帅蒋先生的统率之下”，等等，妄图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特别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要是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抗战就要失败，中国的革命就要被葬送，“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张春桥的《韩复榘》，就是这场喧嚣一时的右倾投降主义大合唱中的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是从韩复榘说起的。张春桥一开始就大肆美化这个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战而逃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说：“他很天真，一种农民的习气，很象苏联的英雄却派也夫同志（注：即夏伯阳）”。并且费了大段笔墨，把韩复榘勾结日寇的卖国罪行说成是“他很简单，也就很容易地上敌人的当，并且一直上当到底”。张春桥为什么要这样起劲地为韩复榘辩护？原因很简单：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战而逃的岂止韩复榘，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战而逃。韩复榘在丢弃泰安时，就曾在一份电报上批道：“南京已失；何况泰安？”正因为如此，所以投鼠未免忌器。张春桥正要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战而逃的蒋介石装扮成抗日救国的“领袖”，所以，在这里就不能不开脱韩复榘，为吹捧蒋介石留下余地。

果然，图穷而匕首现。文章作到后边，主题就点出来了：“现在韩复榘是枪毙了！这一点证明了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也证明了蒋委员长为了对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决心改造已有的军队，就是说：在现在军队的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军！”

这段挖空心思写出来的曲曲折折的文字，很值得我们逐

字逐句地仔细读一读。

“现在韩复榘是枪毙了！这一点证明了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这层意思比较明白。枪毙韩复榘，本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明争暗斗，是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惯技。张春桥却说：不对！“这一点证明了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他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已经说过：“这时候全国上下都在蒋委员长领导底下对日作战。”“现在”，又煞费苦心地找出“这一点”来“证明了”蒋介石确实是有“抗战的决心”的。于是，蒋介石就俨然被装扮成抗日救国的“领袖”了。于是，张春桥一伙大肆鼓吹的向蒋介石投降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有了理由了！

“也证明了蒋委员长为了对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决心改造已有的军队，就是说：在现在军队的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军！”这层意思更加重要。“已有的军队”，自然包括当时“已有”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并已在抗日战场上取得许多辉煌胜利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武装在内。这些军队该怎么办？张春桥说：要“改造”。“改造”成什么？“改造”成由蒋介石来统一指挥的“统一的国防军”。这样做，据说又已被“证明了”是“蒋委员长为了对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才下的“决心”。谁要是反对，他们就可以倒打一耙，给你横加上破坏“对日战争最后的胜利”的罪名！

文章到最后，张春桥在大书特书的“我们主张”中，引了洛甫（注：即张闻天）的话写道：要“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教育与纪律，统一的装备与供给”。一叠声连说了四个“统一”。可见他们的心情是何等迫切。要把人民军队的一切统统都“统一”到国民党反动派总头子蒋介石

石手里。要让中国人民交出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投降。张春桥疯狂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丑恶嘴脸，至此不是暴露得一清二楚了吗！

今年十月，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主席着重强调了：“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又指出：“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这是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最有力的批判和清算。

抗日战争前夜，张春桥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鼓吹“国防文学”，挥舞大棒，围攻鲁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抗日战争初期，他继续坚持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鼓吹“建立统一的国防军”，要把人民军队的领导权拱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并把这一切说成是“为了对日战争最后的胜利”的需要。这就更是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从“国防文学”到“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前后如出一辙：都仿佛出于民族利益的需要，高唱“统一”，主张把什么都“统一”到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统一”到蒋介石手里，向他们实行全面投降。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镇压革命人民，镇压抗日的爱国运动，在蒋介石亲自导演下，出现了一个反动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复兴社。他们制造了一整套法西斯理论，打着“民族复兴运动”的旗号，疯狂叫嚣“一个领袖一个党”，高唱什么“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

长统一中国”，准备在“统一”的旗号下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爱国力量。一九三八年三月，张春桥已经到了延安。他对于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明明是知道的，对于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已成为主要力量的事实明明是了解的，但是他却写了这样一篇吹捧蒋介石、鼓吹向蒋介石全面投降的反动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汉口，由叛徒丁玲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他的腔调，他的手法，又都和复兴社的法西斯叫嚣如此相似。这一切，不是十分发人深思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现在是还张春桥这个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读一读三十八年前他所写的《韩复榘》这篇反面教材，剖析一下他的过去和现在，很可以帮助我们擦亮眼睛，识别和揭露那些混入革命队伍的假“左派”、真右派。这对我们理解当前粉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原载1976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一个日本走狗的供状

——评张春桥的反动文章《济南》

山东大学大批判组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五十一期上，刊登了张春桥的一篇题为《济南》的反动文章。张春桥在这篇所谓“济南游记”里，大写其“景”，大抒其“情”，大发其对国事的慨叹和议论，活活暴露了他的汉奸、卖国贼的卑鄙无耻嘴脸。这是一篇难得的妙文，读了使人眼界大开。文如其人：张春桥不仅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吹鼓手，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而且还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乏走狗，一个卖国求荣、奴颜婢膝的民族败类。

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中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变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反抗呢？投降呢？还是动摇呢？对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奋起反抗的。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号召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侵略，组织东北人民游击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又

号召全中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日本开始侵入华北的一九三三年，中国工农红军发表宣言，愿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接着，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并派遣抗日先遣队，奔赴抗日最前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而中国的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则坚持投降，反对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日寇占领通州，侵逼平津，华北告急。蒋介石非但不下令抵抗，反而于五月三十一日与日寇签定了开门揖盗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四省；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非武装区”，任凭日军自由出入，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塘沽协定”签定后，蒋介石、汪精卫加紧推行投降卖国路线，叫嚷什么“治本莫要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产党”。蒋介石为了推行卖国投降路线，还特别授意一些汉奸文人大量撰写文章，制造投降有理、卖国有功的反革命舆论。于是，一时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等等卖国谬论倾巢而出。张春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抛出了他的《济南》这篇反动文章。他朗读着“济南游记”，积极参加了这场投降卖国的大合唱。这篇黑文完全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需要，博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欢心。因为张春桥在《济南》这篇所谓游记中，扮演的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可耻角色。他拚命鼓吹的是“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汉奸论调。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篇难得的反面教材，看一看张春桥是怎样贩卖投降卖国黑货的。文章一开始，张春桥以介绍济南的地理名胜为幌子，大讲特讲济南的所谓和平景象。他胡说什么济南“现在变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被大日本帝国底大学眼药广告压下去；幽灵的叫喊被淫荡的歌曲压下去；一般人底热情被冰冷的水泼下去；现在，这儿是万分地平静，尤其是深秋的现在，佛峪，龙洞的血色的红叶铺满了山谷，正是骚人们吟咏着太平的一个年头儿”。看，张春桥在济南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就是这样吟咏这太平年月，为血腥屠杀涂脂抹粉，为侵略炮火粉饰太平的。张春桥是戴着汉奸眼镜看待济南形势，估计华北形势的。实际上，这时候在东北，在华北，在济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居民被成批残杀，城市和乡村被毁灭，痛苦和饥荒在增加，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情势下，张春桥不是呼喊救亡，而是大唱和平经，这完全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赞颂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歌功颂德。

接着张春桥以卑鄙下流的流氓语言，尽情地描绘了济南的所谓“风光”。他写了趵突泉，写了金线泉，还写了大明湖。他写这些名胜，用笔非常肤浅、庸俗，而他着力描写的却是“城头马路”。这“城头马路”一无风景，二无古迹，张春桥为何对它那么感兴趣呢？原来不为别的，只为通过描绘“城头马路”，刻画他那日本走狗的可耻灵魂和他那尖腮鼠眼的流氓相。可不是么，所谓“城头马路”者，乃当年日寇“五三”惨案行凶作恶的场地也。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抒发其卖国求荣之情，当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你看他写道，“城头马路最活

泼的时候是夏季。从不同的地方人们聚集到这儿来，象雨后的蛙出来吸收舒适的气息，简直比街上的人还要多。在这儿，绿的，红的，各种不同颜色的，蝉翼般单薄的衣服，包裹着不同的肉体，在这儿跳动着”，“各式各样的游人，一方面是消遣，一方面是‘看人’”。他还特别写道，“为了避免许多人底贪婪的眼睛”，夜深后，许多青年人“花环一般地挽着臂膀，陪伴着寂寞的大地，低低地诉说着各人的春风般软绵绵的乐曲。有时他们还不敢高声地唱一首雅歌或梦中情人的”。写到这里，张春桥还特意加了一句，“只有睡在城头上的人们才能够偷听一点”。够了，够了，不用再加引叙，张春桥这个汉奸加流氓的可耻嘴脸，就淋漓尽致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张春桥这些无耻的描绘，完全是对济南人民的恶毒攻击和诬蔑。他妄图通过“城头马路”的描写，把人们引到那里去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人们游到亡国奴的深渊中去。如果面临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中国人民不奋起抗击，而是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甘当奴才，任人宰割，中国岂不要灭亡吗？因此，这样的游记，写的是卖国之景，打的是投降之情，完全是一篇日本走狗的自白。

张春桥在写完“城头马路”以后，把笔锋一转，大赞大颂起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建筑的“忠魂碑”。张春桥本来要写济南风光，却为什么写起“忠魂碑”呢？这完全是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宣扬日本侵略中国有理、中国反抗有罪的谬论。竭力兜售“中日提携”、“中日亲善”等投降卖国谬论。张春桥引用报纸上一段记者的话，来表达他的卖国贼的心情：“记者特往参观，地址在经六路济南医院后……本市日侨两千余人，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本市男女民众前往参观

者达五千余人，全体日人行祭奠礼以后，并燃放焰火，炮声隆隆，火彩腾空，旋在忠魂碑前表演其强健武力，掌声如雷”。看，“忠魂碑”前的盛况和“城头马路”上的情景，是多么迥然不同啊。张春桥用对比的手法，极力渲染这两种不同的景况，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张春桥这只日本的乏走狗，无非是要胸中燃烧着抗日烈火的中国人民必须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健武力”屈膝投降；必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感恩戴德；必须对侵略者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鼓掌欢迎。张春桥通过对“忠魂碑”的描写，用形象的语言，说出了卖国贼蒋介石和汪精卫当时要说的话。

张春桥在文章开始还转弯抹角地通过描写济南风光，曲曲折折地表述他的卖国投降衷曲，可是到了文章的末尾，张春桥就扯掉了伪装，杀机尽露。他胡说什么“济南，这华北的都市，在马路不平，电话不灵，警察不行下经历过，现在一切却变了”，“我们底都市渐渐地好起来了：站在千佛山或城头马路上可以看到向突飞猛进的路上走的房子。在平时颇为荒凉的经七路一带，现在也完成了民房的建筑，自来水在修筑，农村的人在往这儿跑，朋友，济南马上便可以成为一个华北的更重要的市镇”。济南为什么成了更重要的市镇呢？是什么原因使它渐渐地好起来了的呢？张春桥感慨万分地告诉读者：“我希望你不要惊奇说这里的经济权大都操在日本帝国手里，那是一种胡说”。这是多么露骨的汉奸卖国贼的语言啊！张春桥生怕别人听不懂他的汉奸卖国贼的语言，更进一步强调说：“我们只有在‘共存共荣’下才能够互相提携才能够把济南建筑起来，济南现在不都是日货吗？这便是‘共存共荣’的结果。日本军队底忠魂碑不是建立在济南么？”

听了这些话，不禁使我们想起那个提着军刀屠杀中国人民的
鸠山，这完全是鸠山的语言。然而这些话却是从张春桥的狗
嘴里吐出来的，无怪乎张春桥对日本的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
那么感激涕零，无怪乎他拜倒在洋人的足下摇尾乞怜的丑态
和神情是那么诚惶诚恐。《济南》这篇反动文章，确是一篇
绝妙的反面教材。它对于我们剥开张春桥的画皮，认识什么
是走狗，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投降派，是大有益处的。

张春桥在日本加紧对中国的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中国
面临亡国危险的形势下，写这篇游记，完全是为了开门揖盗，
为了向日本强盗献媚和缴械。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抗日
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
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又
说：“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它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
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
中国人变为亡国奴。”毛主席的这些话，不仅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阶级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而且也是对张春桥之
流的尖锐批判。张春桥在《济南》这篇反动文章里宣扬的正
是这样一种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历史是最好的见
证。一九三四年，正当中央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时
候，张春桥却在济南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忠魂碑顶礼
膜拜，对其日本帝国主义大献殷勤，狂吠“共存共荣”“互相
提携”。这样一个老投降派、老汉奸、卖国贼，今天成为不
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妄图搞垮我们的党，搞垮我们社
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就不是偶然的了，而是有其深
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原载1976年11月20日《大众日报》）

一个老反革命的自供状

——评张春桥三十年代中期的黑作品

吉林省图书馆大批判组

毛主席曾经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今天，我们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同样也需要用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去看他们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妄图篡党夺权，进行卖国投降的罪恶阴谋，终于由投降派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和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的来龙去脉。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发表在三十年代中期（一九三四——一九三八年）的一些“作品”，就一批难得的反面教材，画出了这个钻在革命阵营里的“蛀虫”、投降派的丑恶形象，这也是他披着革命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供状，四十年前反动生涯的历史罪证。今天，真相大白，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终于受到了革命人民的无情惩罚，这是一切反革命两面派都难逃脱的必然的可耻下场。

钻进革命营垒的“蛀虫”

三十年代，是我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复杂的时期。从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日寇变本加厉，猖狂地向我国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

革命锻炼着人民，斗争考验着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在人民群众纷纷投身到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的时候，也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却对抗战抱着敌对的态度，以至认贼作父，成了汉奸、卖国贼；有的看到革命潮流不可抗拒，就钻进革命营垒内部潜伏下来，干着公开的敌人所办不到的勾当。张春桥就属于这后一种人。

张春桥在文章中介绍说，他“是个曾经念过书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他曾在反动军阀韩复榘统治下的济南住了四年多。就在这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他经常步胡适的后尘，去“看一看千佛山的影子”，去饱赏那“自古名士多”的济南风光，去品味“骚人们吟咏着太平的”年头儿所具有的“旧漱玉词般同样的滋味”，还要“在夜深以后”去“偷听”那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公子、小姐们“花环一般地挽着臂膀”、“低低地诉说着各人的春风般软绵绵的心曲”以及“是那么淫荡”的黄色音乐。这种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的反动腐朽的生活，竟使张春桥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流氓式的赞叹：“说句老实话，这地方太那个了。”“四人帮”的狗头军师、政治文痞张春桥就是这样一个每根血管里都流着地主资产阶级血液的花花公子。

一九三四年，张春桥飘零到上海，投靠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门下，摇身一变而成了“左翼”。他象一条变色龙似的，或在进步报刊上，写宣扬右倾机会主义的“作品”，或

用化名在反动的黄色小报上，攻击革命。他化名“狄克”，写黑文章、投黑信，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伟大旗手鲁迅，进行卑鄙的攻击。他鼓吹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为“国防文学底路线”大喊大叫；他“借革命以营私”，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一九三五年，张春桥发表了《老人样的少年》一文，歪曲和中伤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把自己打扮成“最革命”、“最激进”的样子，讽刺、挖苦不愿意跟他去干的人，为王明大搞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提供“根据”。在《生活吧，迎着春光——写给你跟我自己》一文中，他无耻地吹嘘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救世主”，胡说工人如何推崇、膜拜他，“把我当作先生”，“要我在今天的聚会中讲一讲”，以“决定今年生活底路”；他还吹嘘说，要为工人阶级写出一鸣惊人的“伟大”作品来。然而，骗子终归是骗子，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张春桥同工人的接触“这么快乐”，为的什么呢？他说：“这么快乐”却“使我对于自己格外地爱惜起来”。今天，张春桥一伙声称他们“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标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原来正是为了“格外地爱惜自己”，从而爬上高位，骑在人民的头上，吃工农的肉，喝工农的血，搞阴谋诡计，搞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蒋贼的走狗 民族的败类

毛主席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

势和任务》)张春桥三十年代中期的黑作品,篇篇充溢着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毒汁,他今天大搞篡党夺权、卖国投降的罪恶勾当,正是他当年作为蒋贼的走狗、民族的败类的反革命本性的恶性发展。

早在一九三四年,张春桥就在济南写了一篇地方印象记《济南》,发表在上海的《中学生》杂志上,这篇黑文又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编入《都市的风光》一书,流毒全国。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对我山东半岛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控制,开矿山,设银行,修铁路,培植亲日势力,奴役山东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一九二八年更唆使张作霖出兵济南,造成了五月三日的济南惨案,为了进一步炫耀武力,还在济南建立了一个所谓忠魂碑。然而,张春桥这个民族的败类竟在《济南》一文中,声嘶力竭地宣扬日寇的侵略给山东带来了所谓“繁荣”和“幸福”。在张春桥的笔下:

济南,这华北的都市,在马路不平,电话不灵,警察不行下经历过,现在一切都变了,……渐渐地好起来了:站在千佛山或城头马路上可以看到向突飞猛进的路上走的房子。在平时颇为荒凉的经七路一带,现在也完成了民房的建筑。……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惊奇说这里的经济权大都操在日本帝国手里,那是一种胡说,我们只有在“共存共荣”下才能够互相提携,才能够把济南建筑起来,济南现在不都是日货吗?这便是“共存共荣”的结果。

所谓济南“一切都变了”、“好起来了”,是张春桥厚颜无耻、明目张胆地替日寇侵略山东、奴役山东人民的滔天罪行歌功颂德;张春桥把别人指责日寇操纵山东经济命脉,诬蔑为“一种胡说”,甚至公开唱出与日寇“共存共荣”、“互相提

携”的卖国调，无耻吹捧日货。按着张春桥的主张，只有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全部拱手送给日寇，中国才有出路，人们只有当亡国奴，才有幸福。这不是完全说明了张春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吗！今天，如果依了张春桥一帮，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重遭涂炭，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呵！

一九三六年三月，张春桥在反动的《大晚报》副刊上，狂叫：“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而且经过“去年努力”，已经“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六月，加入了“中国文艺家协会”，为适应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的需要，继续狂热地鼓吹“国防文学”。九月，张春桥发表黑文《纪念九·一八》，公然叫嚣鲁迅对“国防文学”的批判使人“头疼”，“不能容忍”；十二月，他在上海的小说家座谈会上继续大放厥词，为“国防文学”摇旗呐喊，声嘶力竭地为蒋介石集团争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张春桥炮制了一篇题为《海燕》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叫朱力夫的家伙，以青年的导师的口吻，鼓动人们去同国民党军队取得联系，求得领导，说只有如此才能“看到了光，看到了爱，也看到了永恒”。张春桥要人们拜倒在那些曾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围剿”工农红军、残酷屠杀工农群众的国民党“官兵”的脚下，做蒋介石的奴才，彻底地暴露出他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走卒嘴脸。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不仅不发动民众，反而对于士兵的抗战处处掣肘，阻挠对前线供应，严重地挫伤了军民的战斗意志，终于使上海在十一月失守。张春桥据此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中国为甚么胜利的？》

掩盖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罪行，大肆叫嚷：“我们的武装战士都是在一个伟大的炉子里锻炼出来的”，“一切中华民族的雄壮美丽集中在他们身上了”，肉麻地把蒋介石吹捧为“抗日”的领袖。

在“国防文学”的黑旗下，张春桥还写了《韩复榘》一文，把统治山东七年之久的反动军阀韩复榘说成是有“农民的天真”的人，“很象苏联的英雄”夏伯阳，一笔抹煞韩复榘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滔天罪行，把韩复榘放弃山东说成是“上敌人的当”。同时又为蒋贼大唱赞歌，说蒋介石杀了韩复榘“这一点证明了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也证明了蒋委员长为了对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决心改造已有的军队”，并疯狂鼓吹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也要归并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国防军”中去，直接充当了蒋介石反革命叫嚣的传声筒。

工农劳动群众的凶恶敌人

就在无耻吹捧日寇、蒋贼的同时，在张春桥的反动作品里，工农群众都被写成了无知、自私、麻木不仁、甘受压迫、任人宰割的“愚氓”。

他的反革命黑诗《俺们的春天》，是写煤矿工人的。张春桥竟用了“尸首”、“犯人”、“机械”、“黑鬼”、“野狗”这类卑鄙下流的词句，恶毒地咒骂伟大的工人阶级。他把自己从上海十里洋场上学来的那一套反动腐朽、糜烂透顶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强加在工人头上，不是恋家庭、谈女人，就是说下流话、吹牛皮。这首黑诗还狂叫工人阶级已经“埋了

春天”，“现在都忘了那些事”——即忘记了革命、斗争。在另一篇《一个土匪》的黑文中，他把劳动人民歪曲成只会跪在地上叩头乞求的可怜虫，居心险恶地散布悲观主义论调，腐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充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吹鼓手和蒋介石反动派镇压革命的鹰犬。

对广大农民，张春桥也是恨之入骨，百般丑化和诬蔑。他的速写《驱逐》，写的是因为一九三四年黄河决口逃荒到城市的灾民们的遭遇。张春桥避而不谈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恶，不去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却大肆兜售阶级调和的谬论，胡说农村自古以来就“含蕴着一团和气”，而农民愚昧、落后、逆来顺受，在饿死、冻死、乞讨和被驱逐的迫害面前，是毫无阶级觉悟，只知乞求老爷们“恩赐”的“乌合之众”。张春桥用自己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农群众丑化得不成样子，充分证明他从来就是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张春桥之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阶级斗争中，都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四人帮”无论怎么阴险、狡诈，怎样把其反革命真相隐蔽起来，但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终归原形毕露，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战斗正未有穷期”，让我们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化毒草为肥料，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原载1976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

鲁迅研究室

妄图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长期以来，一直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甚至恬不知耻地吹嘘说：“在三十年代，‘四条汉子’既迫害鲁迅，也迫害我”，标榜自己在三十年代就跟随鲁迅，保护鲁迅，只有鲁迅和她反对过鼓吹卖国主义的国防戏剧《赛金花》。她还作贼心虚地自我表白：“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江青的招摇撞骗和种种谎话，用鲁迅的话来比喻，只不过“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罢了。历史事实是篡改不了的。翻开历史一查，原来她当时就是一个拴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上的角色，同张春桥一样，也是个向敌人献媚的老投降派！

三十年代中期，为了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王明之流，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里应外合，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文艺界，提出了适应投降主义路线需要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在“国防文学”的降幡下，“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纷纷出笼，一时间，在舞台和银幕上毒草丛生，群魔乱舞。话剧《赛金花》和影片《狼山喋血记》，则是所谓“优秀”的“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的代表作。

就在这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三十年代，江青

窜到上海混进了文艺界，钻入了上海的“名剧团”和国民党反动派官办电影的制片厂。为了争当资产阶级的“明星”，她死心塌地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为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卖力效劳，自觉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卖国的宣传工具。现在，我们从江青在一九三六年进行的三次反革命“表演”，撕下她“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画皮。

一九三六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为蒋介石“五十寿辰”大搞“庆典”，并凑集了七八百万元的巨资购买战斗机、巨型轰炸机八十余架，作为蒋介石的“寿礼”——这就是所谓“献机祝寿”活动。当时江青踊跃参加了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她梳妆打扮，粉墨登场，开幕时登台唱国民党党歌，演出独幕剧《求婚》，为国民党反动派募集资金，以求得蒋介石的青睐。谁都清楚，国民党反动派打着“献机以厚国防”的幌子，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增强“剿共”的军事实力。鲁迅曾经揭露道：“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炸进来”，是指日寇的飞机在我国狂轰滥炸；“炸进去”，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虽然炸手不同，而被屠杀的都是中国手无寸铁的人民。国民党反动派是“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日寇“炸进来”，这就是他们“航空救国”的真相。江青如此卖力地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献机祝寿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她三十年代反动的政治立场。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江青扮演第三号角色的影片《狼山喋血记》（原名《冷月狼烟录》）公演了。虽然观众寥落，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部影片“卖座并不见得如何好”，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动员种种舆论工具，对其大

加吹捧。他们肉麻地说这部影片“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是“一个伟大的寓言”，并宣称“宣传已久的国防电影在这部有力的影片中巩固地确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更吹捧这部影片是“国产影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号称“国防电影标本”的《狼山喋血记》，以及江青在影片中的表演博得国民党反动派的喝采，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国防电影”就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电影”，就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为摄制国产影片规定的三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发扬民族意识，以完成国防电影之使命”。由此可见，《狼山喋血记》迎合的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影片宣传抗日是假，其真实意图乃是炫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抹杀民族矛盾上升时期的阶级矛盾，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影片的结尾，出现了全村人高举火把，高唱《打狼歌》的场面。当时有的观众就有反映：为什么全村亦没有一个不起来的人呢？其实，害怕的和乐于“狼”之胜利者也一定有。事实上，在日本帝国主义“豺狼”向中国进犯之时，蒋介石反动派正是这种引狼入室并“乐于‘狼’之胜利者”。但是，他们这伙卖国贼，却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手法，拚命散布“中国没有汉奸”的烟幕。影片《狼山喋血记》的情节，显然是根据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政治意图构思的。

《狼山喋血记》采用“寓言”的形式也是别有用心的一九七二年，台湾出版了一部内容极为反动的《中国电影史》，这部书透露，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那一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的外交是在忍耐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因此，

任何刺激日本军阀的影片，劝告电影界尽可能的避免，不要作直接的控诉”，“在影片中的敌人日本，不能明显的说出来。用寓意的，象征的，暗示的方式来表现”。《狼山喋血记》用“寓言”的形式处理题材，正是为了体恤国民党反动派这种“又要当婊子，又要立贞牌”的苦衷。江青正是通过摄制《狼山喋血记》这类“国防影片”，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取宠的。

一九三六年与《狼山喋血记》先后上演的话剧《赛金花》，是鼓吹投降卖国路线的又一黑标本。剧本全力歌颂了一个极端仇恨人民，背叛民族利益，将灵魂和肉体出卖给帝国主义的汉奸妓女赛金花。这个赛金花，整日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军头目身边周旋，为其献计献策，奔走呼号。赛金花这样一个民族败类，在剧本中竟被吹捧为“保全”了北京的“大救星”，使人民“免受杀戮”之灾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鲁迅曾怒不可遏地指出：“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当这出鼓吹卖国投降路线的反动戏剧准备搬上舞台时，江青竟无耻地把这当作飞黄腾达的好机会，拚命地争演赛金花。当导演嫌她演技差而安排她充当配角时，她闹得不可开交。江青这种卑劣表演，把她那种投降卖国的丑恶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

仅从上述三次丑恶的反革命表演，不难看出，三十年代的江青，根本不是什么“进步文艺工作者”，更不是什么被迫害的对象，而是一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忠实地追随王明、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并为其大造舆论的一名无耻走卒，是为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效尽犬马之劳的老投降派！

四十年以后的江青，摇身一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她以更加阴险的手腕，袭用三十年代的老谱，跟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反党集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猖狂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她无耻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战友”、“学生”，实际上却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过去她虚情假意地表白：“我什么也不希望，只希望我能做一个演员。”如今，她野心勃勃，自比武则天、吕后，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位。正如毛主席斥责她时所说：“江青有野心”！三十年代的蓝苹和七十年代的江青，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三十年代老投降派的丑恶灵魂，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到了七十年代，终于走上了一条向上爬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道路，一条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

我们同江青一伙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三十年代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继续。我们必须撕下她的伪装，剥掉她“三十年代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画皮，让她的原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永远充当教育子孙后代的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原载1976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从争演赛金花到为蒋介石祝寿

文物出版社批判组

一九三六年四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进一步深入我国土，蒋介石反动派一面继续向日寇出卖华北、一面加紧围攻我陕北根据地的时候，正当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挥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的时候，《赛金花》出笼了。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这年八月里写的《“这也是生活”……》的杂文里，愤慨地对《赛金花》剧作及其吹捧者加以抨击：

“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这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剧作《赛金花》的要害：那个被它封为“九天护国娘娘”的赛金花，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媚妓卖国婆，所谓“国防剧作”，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卖国剧作”。这样的剧作，理所当然地受到积极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人的高度赏识。

无独有偶。在前不久揭发出来的“四人帮”反党集团里，紧跟着“国防文学”的黑旗跑的，不仅有那个躲在“三月的租界”里，化名“狄克”，向敌人“献媚”，替敌人“缴械”的张春桥，而且还有一个混迹十里洋场，如蝇逐臭似地争演赛金花的蓝苹，即江青。

《赛金花》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发表在上海的《文学》杂志上，同月二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出了一则《见闻偶记——蓝苹将演赛金花》的消息，内称：“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就，现在来演出《赛金花》，想来成绩当也不致错的。”这年在上海出版发行的《赛金花》这本书里，附有业余剧社公演《赛金花》剧情的全体演员照片，其中就有蓝苹的照片，并且注明她将扮演一个小妓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赛金花》首次在上海金城戏院演出。然而，演员中却没有蓝苹，演出单位也不是蓝苹所在的那个“业余剧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蓝苹和该剧社的另一个女演员争着要演赛金花，蓝苹既不肯扮演剧中的一个小妓女，充当配角，又不肯和另一个女演员同任AB角，同演赛金花，执意要自己主演。结果，这个剧社不得不中途放弃了排演《赛金花》的计划。

江青虽然没有演成《赛金花》，可是，她那争演赛金花的行径，却不失为一场绝妙的自我表演。

鲁迅是那样尖锐地抨击《赛金花》，而蓝苹却是那样强烈地争演赛金花。这就无需争辩地证明：当年的江青是站在鲁迅的对立面的人物。江青争演赛金花，是为了个人出风头吗？诚然，闹出风头从来就是江青的一大特色，但是这次争

演赛金花，绝非仅仅为了个人出风头，而主要是出于她反动的政治立场。这也就是说，江青是拜倒在赛金花的脚下的，而且想通过赛金花的舞台形象来“教化”中国人，让中国人都跟着赛金花那样的人跑。

赛金花原本是清末的一个妓女，后来做了状元出身的大官僚洪钧的小老婆，随着洪钧出使欧洲，结识了不少洋大人，浑身熏染上崇洋媚外的奴才习气。洪钧死后，她又开了妓院，做老鸨兼妓女。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她卖身投靠洋大人，做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姘妇，尽力为帝国主义侵略军筹军粮，找女人，被侵略军称为“漂亮的军需官”。赛金花站在民族叛徒的反动立场上，敌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同时，又极力维护反动腐败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协助汉奸刽子手李鸿章和帝国主义侵略军谈妥了屈辱卖国的条款，换取了逃在外地的慈禧和光绪“两宫回京”的条件。这样一个无耻透顶、反动至极的民族败类和阶级敌人，在《赛金花》剧中居然被吹捧为“北京的大恩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正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俨然成了“九天护国娘娘”。

江青对于她在三十年代争演赛金花的这一卑鄙行为一直讳莫如深。为了掩盖当时的劣迹，江青煞费苦心地为自已绘制了各种美丽的画皮，乔装打扮成在三十年代是“同鲁迅站在一起”的战士，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如果说，江青争演《赛金

花》是她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的大暴露，那么，她在同一年里参加为蒋介石“献机祝寿”演出的活动，则表明她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要关头，对内搞的是阶级投降主义。而这种阶级投降主义本来就是和民族投降主义紧密相连，二位一体的。

当时江青争演赛金花未能如愿以偿，与此同时，她有了更“出色”的表演。这年十月三十一日，是反共卖国的独夫民贼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决定趁此机会掀起一个“购机祝寿运动”，来搜刮民脂民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指使下，反动青帮头子黄金荣在这年六月十四日出面召集上海电影界人士，策划在上海“作一大规模之游艺会串”。接着，他们就调动各种反动舆论工具，通过宣扬“献机祝寿”，大肆为蒋介石歌卖国之“功”，颂反共之“德”；什么“群星献机”呀，什么“千载难逢”呀……一片鼓噪之声，实在令人作呕！

就在为蒋介石演出“祝寿”这一丑剧之际，蓝苹即江青梳妆打扮，欣然登上金城戏院的舞台，同“群星”齐唱国民党之歌，然后演出了独幕剧《求婚》。

四十年前江青的这两次表演，贯串着一条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黑线，暴露了她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江青等一伙坚持其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反动立场，他们对洋财东更是低三下四，媚态可掬；而对中国人民，却更加横暴恣睢，杀气腾腾。他们里通外国，不惜出卖党和国家的机密，以换取洋人的笔为自己树碑立

传，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更为恶毒的是，他们对一些过去同国民党反动派作过坚决斗争、现在又一直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则扣上“民主派”、“同路人”等大帽子，企图把他们一律打倒，为“四人帮”更放肆地搞卖国投降活动扫除障碍。今日之江青，其崇洋卖国的行径，较之四十年前的蓝苹，真正是变本加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四人帮”就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打烂了“四人帮”，江青隐藏在黑纱巾下的党奸、国贼、民蠹的丑恶嘴脸，终于被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毛主席生前英明决策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原载1976年11月18日《光明日报》）

最无耻的汉奸理论

——斥江青一九三七年的

黑文《三八妇女节》

立 军 泽 清

以“文艺革命旗手”自诩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自吹在三十年代就很“革命”，是一个“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同鲁迅站在一起”，反对鼓吹卖国主义的国防戏剧《赛金花》。

事实怎么样呢？正是这个江青，在鲁迅尖锐批判《赛金花》、辛辣地揭露这个“九天护国娘娘”的汉奸妓女的丑恶面貌后不久，她就拚命要争演这个汉奸妓女赛金花，要在“国防戏剧”的舞台上卖力地鼓吹王明投降卖国路线，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献媚。不仅如此，她还通过各种形式竭力吹捧赛金花。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上有一篇题为《三八妇女节》的奇文，这篇奇文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呼吁影剧坛的剧作者们多“产生剧本”，并强调要产生如同《赛金花》之类“很有意义，很优秀的创作”。这篇奇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蓝苹”，即江青。

江青呼吁多写《赛金花》这样的“优秀作品”，理由之一是，“不忍看中国妇女残遭欺侮”。在江青看来，有了赛金花这样的“救世主”，充当外国侵略军头目的姘头，把灵魂和

肉体都出卖给帝国主义，这样，“中国妇女”就不会“残遭欺侮”了。在江青看来，当了汉奸不仅不可耻可鄙，而且还得给她一个“救国救民”的“英雄”称号。这就难怪江青当时为什么拚命要争演“赛金花”、为“赛金花”摇旗呐喊了。江青鼓吹大写《赛金花》之类剧本的另一理由，据说是“现今”中国只有一个《赛金花》“还是觉得不够”，只有这样的剧本多了，“被窒息将死的妇女们”“才能解救”！好家伙，一个“九天护国娘娘”还不够，还要一大群。在日寇大兵进犯的危亡时刻，她要大家都去效法“赛金花”，出卖民族利益，卑躬屈膝，拱手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奉献给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什么理论？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耻更卑劣的汉奸理论吗？由此可见，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就是个鼓吹投降卖国的“国防文学”的马前卒。

四十年过去了。“赛金花”这具僵尸早已臭不可闻。然而，“赛金花”的幽灵还在。当年在戏剧舞台上竭力争演“赛金花”的江青，竟然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干起“赛金花”的卑劣勾当来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的“赛金花”，充当洋奴，里通外国，卖国求荣；今日的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出卖大量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干着里通外国的罪恶勾当，奴颜婢膝地拜倒在帝国主义者的脚下。当年的“赛金花”，为侵略军充当“漂亮的军需官”，疯狂地镇压义和团革命群众；今日的江青，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迷梦，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企图打倒一大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凶残地镇压、迫害革命群众，要把中国重新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深渊。江青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真是远远地“赛”过“赛金花”。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天，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白骨精江青的画皮被剥去了，丑恶嘴脸毕露了，原来江青是一个比汉奸妓女赛金花更无耻更可恶的民族败类和帝国主义奴才。

(原载1976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

姚文元是个尊孔派

“四人帮”的成员姚文元，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他的骨子里浸透着孔孟之道。他和“四人帮”其他成员一起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起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搞的这一套，同孔孟之道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他却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把自己打扮成了“批孔英雄”。现在，我们要剥他的画皮，揭他的老底，亮他的本相。

一九五八年一月，正当全国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伟大胜利，大跃进的局面正在形成的时刻，姚文元抛出了一篇题为《评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和钱谷融等辩论》的文章（后来还特意收罗在他的那本《文艺思想论争集》里面）。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打着评钱谷融的幌子，无耻地吹捧孔老二，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他胡诌什么“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这完全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孔老二生活在春秋末期，正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那时天下大乱，奴隶起义风起云涌，从根本上震撼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新兴地主阶级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纷纷实行“变法”，开展夺权斗争。奴隶制土崩瓦解，封建制蓬勃兴起。孔老二眼看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快要完蛋了，于是提出“克己复礼”的反

动纲领，妄图回复殷周奴隶社会的礼制。孔老二明明是中国历史上复辟派的祖师爷，姚文元却硬要为孔老二大唱赞歌，这是他的反动阶级立场的大暴露。

毛主席早就明确地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论人民民主专政》）姚文元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竭力宣扬孔老二反动的“仁政”。他叫嚷什么“孔子提出的‘仁’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等级制度”，“在当有时有它的积极意义”。孔老二反动思想的核心，就是这个“仁”字。这个“仁”，本来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武器。奴隶主统治者提倡“仁”，就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成员之间亲爱团结；同时还要欺骗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让他们安分守己，服从统治，不要反抗。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对“仁”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发挥。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就是说，只要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归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了。可见，孔老二的“仁”就是要复辟奴隶制。姚文元狂热地鼓吹孔老二的“仁”的“积极意义”，其罪恶目的是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对反动派施仁政，好让反动派在中国复辟。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忠恕”，是孔老二的“仁”的一项内容。孔老二提倡“忠”，就是要忠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孔老二提倡“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决不是要对奴隶实行宽恕，而只是要新兴地主阶级对那些没落的奴隶主实行恕道。总而言之，“忠”也好，“恕”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复辟奴隶制。姚文元在这个问题上，也拚命地往孔老二脸上贴金。他胡说什么“孔子主张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

道’，但这个‘恕’同他提倡的对于封建制度的‘忠’是统一的。‘恕’正是为了使封建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斗争，不复仇，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这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孔老二明明是要人们视、听、言、动都不得越出奴隶制的“礼”的规范，而姚文元却把这一切说成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说。早在解放前，刘少奇就鼓吹过要象孔老二那样讲“忠恕”。解放后，姚文元又一次跳出来宣扬孔老二的“恕道”，这决不是偶然的。在解放前，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就是搞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解放后，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就是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所谓“正名”，也是孔老二的“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用主观的观念（“名”），去规定和“匡正”客观的存在。孔老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社会发生了变革，奴隶制统治秩序乱了套，“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在孔老二看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于是，孔老二气势汹汹地要“拨乱世，反（返）诸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要“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妄图用奴隶主阶级的观念，去规定和“匡正”正在变革的社会存在，恢复奴隶制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挽回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颓势。可是，姚文元却说什么“孔子竭力主张‘正名’——每个封建阶梯中的人都自觉地安守自己的地位，不作违反自己等级的任何行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就表现了他的基本

思想。”孔老二讲“正名”，明明是为了复兴“礼乐”，复辟奴隶制，姚文元却说成是为了“每个封建阶梯中的人都自觉地安守自己的地位”。姚文元如此起劲地为孔老二的“正名”辩解，就是要恢复地、富、反、坏、右原有的名位，反对社会大变革。

姚文元狂热地鼓吹“仁政”、“恕道”、“正名”之类的孔孟之道，说它“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是“值得批判地吸取的东西”。这就充分暴露了姚文元本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正是这个狂热的尊孔派姚文元，从五十年代一直隐藏到七十年代，伪装“革命左派”，冒充“批孔英雄”，伙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结成“四人帮”，狼狈为奸，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然而，孔老二的亡灵挽救不了一切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这正是反党分子姚文元之流的生动写照。

我们一定要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四人帮”同他们所供奉的孔老二亡灵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1976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褪其华裘 示人本相

——评姚文元的尊孔言论及其它

柯文平

反党野心家姚文元善于投机，善于赖账，善于象变色龙似的变换颜色。他就是靠着大耍反革命的两面派花招，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左派”，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招摇撞骗，欺世盗名。近十年来，他窃居要职，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承袭着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阴谋篡党窃国，做尽了坏事。现在，他和他的同伙终于恶贯满盈，末日来临，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鲁迅先生说过，对于那些资产阶级投机政客，不妨查查他们的旧账，“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准风月谈·查旧帐》）。对投机成性的姚文元，我们也须要剥去他的伪装，还他的本来面目。

姚文元的旧账很多。尊孔，有他；吹捧毒草小说，有他；宣传陆定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创作主张，也有他；唱“有益无害论”，又有他；写杂文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还是有他。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我们现在不妨先从尊孔、《红楼梦》评论和《水浒》评论这三个方面说起。

一九七四年春天，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四人帮”继续沿用他们一贯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接过革命的口号，大搞反革命的勾当。他们提出所谓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实际是用来干扰和破坏批林批孔的革命大方向，以达到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目的。他们兴风作浪，打击好人，陷害干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搏斗中，我们看到，正是这个姚文元，伙同江青等，说这个“是‘儒家’”，那个又是“尊孔派”。“钢铁工厂”的棒子遍地扫，“帽子工厂”的帽子满天飞，可就是偏偏想赖掉他们自己尊孔的事实。翻一翻姚文元的文章，白纸黑字，分明写道：“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积极作用，他的学说中有不少值得批判地吸收的东西”。（《文艺思想论争集》第299页）

姚文元还说，孔丘主张的“恕道”，孔丘所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

姚文元又说，“孔子所提出的‘仁’”，“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等级制度”。

歪曲历史，颠倒是非，把孔丘这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说成是新兴的封建制度的拥护者。这是姚文元歪曲历史，尊崇孔丘的真面目。

大家都知道，解放以来，史学界对孔丘的评论，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看法，大致上区分是肯定和否定，尊孔和反孔。但如果作一点仔细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象姚文元那样毫无保留、毫无限制地吹捧孔老二，并不比别的尊孔言论逊色的。这就确切地说明，姚文元对孔丘是何等地热衷！何等地拜倒！

就是这样一个人地地道的尊孔派，却居然要充当批孔的“英雄”。人们记忆犹新，一九七四年春节，姚文元坐在首都体育馆一次万人大会的主席台上，摆起架子，就批孔问题指手划脚，说东道西，还俨然装出解释毛主席诗词中批孔思想的“权威”姿态。演着一场分明是强盗，偏要装“圣人”的戏，却一点也不脸红，半点也不害臊。真正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二

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稍前一个时候，在评论《红楼梦》的问题上，姚文元也同样演出了一场装腔作势、文过饰非的鬼把戏。

那是在一九七三年。还是这个姚文元，以传达毛主席提倡读《红楼梦》的指示为名，同江青一唱一和，大肆贩卖私货，蓄意攻击别人。他们给别人扣了很多帽子，捏造了种种罪名。惟独又赖掉他们自己在《红楼梦》问题上的种种谬误。

这里且不说那个自封为“半个红学家”的江青就《红楼梦》所讲的胡言乱语。就是姚文元这个所谓的“文艺批评

家”，自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发起批判《红楼梦》研究的伟大运动以来，从未写过一篇象样的谈《红楼梦》的文章，但在别的文章中，他也谈到过《红楼梦》。话虽不多，却很奇特，称得上是典型的奇谈怪论。

姚文元说：“曹雪芹是用贾宝玉、林黛玉的眼睛去观察大观园的人物和是非的，他创造出了一幅异常真实的社会图画，如果他是用贾母的眼睛或宝钗的眼睛去观察大观园的人物是非，宝玉就会被写成真正的呆子，黛玉就会被写成尖酸刻薄寡廉鲜耻的‘荡女’了”（《文艺思想论争集》第41页）。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能够创造出这部小说，是因为他具有当时比较先进的世界观，从根本上说，又决定于当时存在和发展着的先进的社会力量。

《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反映了行将解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或社会图画，首先是因为它描写了以贾家为主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败、没落过程，从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再现了当时的政治历史风貌。这些，即使是具有当时先进思想的曹雪芹，也是不可能完全自觉认识到的。这就是说，《红楼梦》整个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和具有的政治历史意义，是不能也不可能只按照曹雪芹的主观思想和用意去解释的，更不用说用贾宝玉、林黛玉的眼光了。

值得注意的是，姚文元发表那种奇谈怪论的时间，是一九五七年。那时已是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也就是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红学”批判三年之后。因此，姚文元的那种奇谈怪论不仅十分错误，十分落后，而且实质上是一次为胡适派“新红学”观点翻案的问题。

所谓“曹雪芹是用贾宝玉、林黛玉的眼睛去观察大观园的人物和是非的”，这岂不是等于说，在《红楼梦》表现出来的是非看法上，曹雪芹的眼光，就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眼光吗？这岂不是等于说，曹雪芹的思想就是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吗？那末，这和胡适所讲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有什么根本区别呢？不正是胡适语言的一种翻版，旧“红学”的花样翻新吗！

姚文元一九五七年发谬论，一九七三年充正确，难道靠着时光的流逝就可以一概抹煞昔日的错误言行吗？不能！发谬论的前账要清算，充正确的假面要揭穿！

三

姚文元这类反革命两面派，赖旧账是为了搞阴谋。他在评论《水浒》的问题上发展到了更为可恶、更为可恨的地步。

一九七五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的当天，姚文元赶忙写了一封信。信中只字不提自己在《水浒》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却把矛头专指别人，他却扬长脱身，还是装扮成“一贯正确”。

事实是，姚文元对《水浒》也没有少用过“伟大”这样一些形容词，也没有少说过《水浒》是“现实主义”这样的赞美话。其中荒谬而又荒唐，且有“独到见解”的，则有下列这段文字：

而且许多作家还经常承受着他的世界观中进步的思想同落后的（乃至反动的）思想的矛盾；承受着他世界观中落后的部分和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矛盾；承受着他的进步的主观理想同客观现

实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时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这种矛盾归根结蒂限制了甚至损害了作品的内容。果戈里在创作新人时的失败，曹雪芹在贾宝玉性格上、出路上的某些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水浒传的英雄们终于接受了“招安”，都是说明了这种矛盾。但由于这是在过去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我们往往把古典现实主义作家这种限制，叫做历史的限制。（《细流集》第17页）

谁也没有听说过，一个作家用歌颂的态度描写投降派，是由于存在着什么“世界观中进步的思想同落后的（乃至反动的）思想的矛盾”。批判和反对投降，就是受进步思想所支配；歌颂和称赞投降，就是为反动思想所驱使。两者泾渭分明，冰炭难容。既然《水浒》作者已经美化了投降派宋江，就说明了这种描写是由于他的反动世界观，哪里是由于什么世界观内部的“矛盾”呢？

谁也没有听说过，一个作家歌颂投降变节者，是因为“世界观中落后的部分和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矛盾”的结果。如果这里说的“世界观中落后的部分”指的是作家具有封建正统思想，因而赞扬宋江受“招安”，倒还说过得去，但是，无端扯上“现实主义艺术方法”，那只能是以自己的不通来装扮“理论”的“高深”，而终于，这个“理论”依旧荒谬不通。

谁也没有听说过，一个作家歌颂投降派，是因为他存在着“进步的主观理想同客观现实的矛盾”。如果这里的“客观现实”指的是历史生活中宋江原型有过投降的事实，那末，一个有“进步的主观理想”的作家描写它，应该是批判而不是歌颂，怎么倒是会颠倒过来，去歌颂宋江而不去批判宋江呢？作家的“进步的主观理想”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一句话，凡是歌颂投降派，就不仅是作家有什么“落后”

观念，压根儿就是反动思想在起作用，决不是由于什么世界
观的“矛盾”，也不是由于其他什么“矛盾”。不过，姚文元的
混乱的语言，奇妙的逻辑，却掩盖着他的真实思想。他是在
为《水浒》作者的反动思想辩护，说到底，又是为宋江辩
护，为投降派和叛徒辩护。

姚文元为什么要为投降派和叛徒辩护呢？只要看到鲁迅
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给肖军、肖红的信中曾指出姚蓬
子（姚文元的父亲）“转向”，即背叛革命，向国民党反动派
屈膝投降，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凡是涉及到投降、叛变，姚
文元就有难言之隐，切肤之痛。因此，他在谈到《水浒》时
搬弄这个那个矛盾，却也并非只做了概念游戏。他曲曲折
折，隐隐晦晦地为《水浒》作者辩护，实际上正是反映了他
的一种反革命的政治态度，一种反动的阶级立场。

我们也知道，涉及到投降、变节，不光是姚文元一个
人，“四人帮”全伙都是胆战心惊的。因为他们就是搞修正主
义搞投降主义的丑类，他们就是当代的“宋江”。象张春桥和
江青，在历史上还都是老投降派。江青这个老投降派，还不
止一次吹捧过《水浒》中的宋江，说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历
史人物”，是什么“同封建阶级坚决斗争”的“英雄人物”！赞
美宋江，正是他们投降主义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指示，毛主席的“使人民都
知道投降派”的战斗号召，实际上就是针对王张江姚“四人帮”
的，它沉重地打中了这个反党集团的要害，也是对他们的严
重警告。

然而，他们并不就此收敛，并不就此停止罪恶活动。于
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在《水浒》评

论中出现了。“四人帮”背着中央，又是发表讲话，又是下达指示；划框框，定调子；移花接木，嫁祸于人。他们打开了他们操纵的诽谤的闸门，夹枪带棒，含沙射影；借题发挥，捎三拐四；名为评《水浒》，其实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时间，几乎一切肮脏语言，龌龊字句，甚嚣尘上，汹涌而来。好家伙，真想冲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冲垮无产阶级司令部。

然而，他们这一次也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的卑鄙野心和阴谋勾当，再一次激起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莫大义愤。

姚文元及其“四人帮”同伙这种赖旧账，搞阴谋的恶劣本质，借用《红楼梦》中一句话来说，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

他们以莫须有的虚假罪名，诸如什么“尊孔派”“复辟派”“投降派”，强加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身上，这就是“假作真”，即以假作真。而他们自己，既是一帮货真价实的尊孔派、复辟派和投降派，又是假马克思主义假革命的政治骗子，这是“真亦假”。

现在，这个反革命“四人帮”的真面目彻底揭露了。根据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为党锄了大奸，为国除了大害，为民平了大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欢声雷动，拍手称快。请看今日的中国，“万木霜天红烂漫”，“战地黄花分外香”。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勇敢，更加奋发有力地战斗吧！

（原载1976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

附录

张春桥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俺们的春天

张春桥

大清早：太阳还没睡醒，
朦胧的天上挂着些花，
高楼吻过黑夜还恋着星，
烟筒张开了粗大的喉咙，
把都市底动脉喊得乱动。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街上只有俺们一伙，

像一排犯人样走着。

大家有些骄傲：

“咱们是长在大地方的！”

说起这真是笑话，

这地方简直像个戏台：

刚刚下去一群，一群又上来，

像件死了的机械，

就让白天里楼上吐出个没名的歌调，

落在俺们底心上，

像微风吹过一样，

俺们没见过春天的，

春天只走到楼上。

住在地下层的黑鬼，

只能挥着黑的拳头，

从早晨到明日连成条线，

从一年到没数的年，

眼前是皮带，马达，

手里也是那东西，

也许你有些不信：

“那里能不休息？”

实在不是谎话，

俺们就是这样，

一直死到里面，
像死去只野狗，
埋了春天和秋天
（到底有啥分别呢？）
很久以前的时候。

现在都忘了那些事，
（俺们也见过春天吗？
现在谁也忘了）！
可是还都希望回来，
满树的春花齐开。

（上海《文学季刊》1卷4期，1934年12月）

济 南

张 春 桥

济南，把握着华北的喉管，风景秀丽，而且有“自古名士多”的称语的地方，在我们底视线下时常地瞧到过的。

我们看见两条铁色的路线在山东底地图上走过，另外还有一条河，在这儿流过，而且都是经过济南的。它们，铁路和河流，把农村底骨髓吸过来，流动地，那骨髓把济南底房子撑得胀着肚皮；渐渐地，渐渐地，从平房到楼房，从楼房到更高层，并且从城里一直到离西门几里地的纬四路以西了。

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一个诗人们歌咏着的五月，在这儿发生了一次屠杀，屠夫临走时在这里留下了不能泯灭的痕迹；凡是来到济南的人都会忆起这是一个飘过血腥的风的地方。但是，现在变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被大日本帝国底大学眼药广告压下去；幽灵的叫喊被淫荡的歌曲压下去；一般人底热情被冰冷的水泼下去；现在，这儿是万分地平静，尤其是深秋的现在，佛峪，龙洞的血色的红叶铺满了山谷，正是骚人们吟咏着太平的一个年头儿。

假如你喜欢看一看名胜，当然是可以的。

谁也知道有趵突泉，但是，趵突泉现在是太荒凉了。也许在明年春天，这儿会变成一个新的姿态的，现在却只有一片破瓦和碎砖。自来水开凿机咯拉拉地吼叫着，用木架扶助

着的机器便在有三股水的那个池子里。三股水在八九年前还像一个新泉般地突出水面，成了三个白色的花朵，现在却只能寻出它底痕迹了。也许这是济南底一件大损失。但是，代替他的却是六个突露出泉眼的铁管，这是在去年建设厅测验济南水性及量以备按设自来水时而制成的，现在，从天明到天明，它用大声的号叫震动着这一个寂寞的院落。所以说，你并不必需愁着趵突泉这名胜会从此完结了的。

出了趵突泉后门往东不远，便是金线泉。虽然他的名字是“金线”，《老残游记》上也曾记着有一条金线这回事，但是我找了好几次，却都没有能够寻得那条线，无论是早晨、黄昏、或太阳光下。

当你通过了尚志堂的院落的时候，风车格龙格龙地响着，向人们报告着许多新的讯息。就在这院子的西边有一座圆形的门，你走进园门以后必然地会感到温和与幽静的气象在春天，丰满的花朵在树枝上成穗地坠着，秋天的时候，也同样地给你一幅暮年的图画。轻风飘过肥大的浓绿的芭蕉叶，拂过密密层层叶子，阴暗的影子也同样地摇晃着，使人如同得到一个难题底满意的答案一般愉快。

来这儿的人本来就少，（现在是某校的课室院）。夏天过去以后，这儿的人便更少了。以前，在交映着花香和鸟语的花架下，你捡一块清洁的石头，或一片碧绿的草地，蹲在那儿，听一听小虫爬过石缝的声音，或者知了底缓慢的叫喊，便会忘记了过去的苦乐的。秋天呢，虽然一切都已隐起来了，蟋蟀又在墙角里唱了。

无论什么时候，从金线泉淌出来的那一股清得透亮的流水，总是弯弯曲曲地绕过一座水亭，再和从漱玉池里淌出来

的一道清流相汇和，在漩涡中急急地往西边墙外流去。在水亭的西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积水潭，碧绿的积水，一望无底；微风带着芬芳的花香或落叶荡过水面，吹得一层薄薄的绉纹，浮在里面的萍草也跟着漂动，草间的银白色的短鱼翻着身子，互相地追逐着，有时也在水面上吐出白色的泡沫，便搅得一汪涟漪，加上浓绿的树影映在水里，看去简直是一池名贵的新酿成的醇酒，如果是春天，缀上几朵残红，便更加添了他色泽的美丽，而且要真个来饮一杯了呢。

金线泉据说便是词人李清照的故居，名贵的《漱玉词》大都是在这儿写成的。现在，漱玉池已经不是往日的面目，但仍旧和我们旧《漱玉词》般同样的滋味。

从金线泉出来，不多远便是大街了。当然，这儿的街和中国的普通一点的大都市一样呈现着声、色、和力的。尤其是在街上，我们更可以发觉到这一点的。这儿已经从石子路变成光亮的柏油路了。

也许会使人惊奇，虽然还有“×门大街”这名儿，城门却找不到。那便是“五三”底赐与，那次屠杀的火花烧去了城门楼，便干脆地去了，而且修成了城头马路。但是，太容易马虎了，我们很容易地把他放过了视线的。

城头马路虽然还没有能够达到环绕济市的目的，现在从西门月城上去，可以绕一个大半圆，到南门下来，大明湖的全形便展开在我们底视线里。

城头马路最活泼的时候是夏季。从不同的地方人们聚集到这儿来，像雨后的蛙出来吸收舒适的气息，简直比街上的人还要多。在这儿，绿的，红的，各种不同颜色的，蝉翼般单薄的衣服，包裹着不同的肉体，在这儿跳动着。在先是杂

着各式各样的游人的，一方面是消遣，一方面是“看人”，虽然，大家都是人，也得互相地批评的。在夜深以后，人渐渐地减少了，才重新走上一批新的人物，那是青春的年青的人们。他们为了避免许多人底贪婪的眼睛，才在这时候花环一般地挽着臂膀，陪伴着寂寞的大地，低低地诉说着各人的春风般软绵绵的心曲。有时他们还不敢高声地唱一首《雅歌》或《梦中情人》的。——这是很少能见到的时候，只有睡在城头上的人们才能够偷听一点。

不要忘记的，在城头马路上可以看到济南底轮廓。我们可以看到电灯公司底钢铁与水泥合成的建筑，或者只能暂时避去风雨的茅屋，可以听到绵绵的私语，城外小清河及胶济路上却有着人底吭唷吭唷的喊声和机器转动的伟大的交响，这两种声音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线，那一个在死亡，那一个在生长，我们是知道的，在黑色的汗毛擎着颗颗的汗球的时候自然地发出来的声音，自然是比用尽思想制造出来的好得多。

往城里面看：北城大部份被大明湖占有了。虽然有时间断，或者成了陆地，但它总是谁都知道的大明湖。大明湖，在北城，占去了整部的面积，寄生在它身上的人自然是不少，在藕与鱼的产量上说也还可以，虽然农村经济破产，并没大影响到这里，每天这里还依旧可以看到外来的游客。从城墙下来可以在大明湖边玩玩，在晚冬及初春更可以看一看千佛山的影子，千佛山的影子的确是可以看到的，在晚冬或初春，湖面雪冰已经化完，新芽还没有抽出来的时候，便可以看到的。地点呢，据我知道的有：鹊华桥西下坡和乾健门里及铁公祠，都可以看到，以乾健门里为最清楚。

顶好是没有一点儿风，湖面平静得像一面玻璃，千佛山深灰色的影子便映照在里面了。虽然胡适之博士曾经考证过，结论是没有，其实那都是不对的，至少我们曾经亲自看到了。——千佛山，在城南，你在城墙早就看到了：在一列长长的山峦起伏中，生长着较多些的树木和古旧的庙宇的便是。这便恰巧在你从南门下来的时候，如果想去，就约莫在十几里的地方，你走着去，很快便能到了。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本来，山就没有水好，何况千佛山又没有泉子呢。在济南游山最好到龙洞跟佛峪，在秋天，顺便看红叶也很好。不过离城在三十里以外，步行时，早晨四点出发，晚上才能回来。如果想到佛峪去，就得住宿一夜，才能够尽情的看一看呢。不然，回来便太疲乏了。佛峪及龙洞的石头有些都是能够动人的，千佛山则永远那么呆板。假如一个名士或者“诗人”，在这里也许能够寻得些画意或其他，尤其是在他们所需要的秋天，龙洞道上总比佛山道上来得人多。

在济南如果你想找都市的声、色、力，也很容易的。劳动者们底声是高亢的，使得我们兴奋，那声音推动着时代底齿轮。我们在经一路最容易听到。因为经一路是一些灰栈和胶济车站的所在地，排车或推车，车轮的声音粗喘着；火车轧轧地号陶的声音，这一切都市的声在交奏着一阕悲壮的歌曲，因为济南是没有码头的。另一种声便是大街了：这里是市民底音乐。是那么淫荡，和着灯光，在尽力地吸引顾客，广播机的用处，在济南便是如此。

还有一种，那便是小巷，安静的空气里动荡着三弦的余音，盲者底铜锣声，是静的，静到使人沉默。像一块砖头掷入水中，波纹般地那声音泛开了。

色，力，也同样的可以找到那三种。

济南表面上是太沉默太平静了，但是，她底内层却蕴蓄着一个大的危机。我们知道：山东是日本底经济圈的，横亘在地图上的胶济铁路是德国造成，又归日本，现在才部份地归中国管理；日本帝国底“国民”还有相当的大势力展开在那儿。青岛，济南，周村，潍县，博山也都有日本侨民的商业上的优势。在济南只以当业来论，据统计一九三三年便在二百万以上，——这都是从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用种种手段剥削下来的。这以外，白面——海洛英底销路更大，我想他会比商业还要大。记得日本特派考查员山村氏曾说过：山东底商业（日本侨民经营的）并不坏，而且没有危机。但是，我们底货物便更不容易销售了。这地方；你到各市场去看看，“Made in Japan”或者改头换面的所谓国货，实在是到处都是。说句老实话，这地方太那个了。

就在写这篇文字的头一天，日本帝国主义的侨民为了纪念“五三”时他们底军队因侵略而死亡的人，建立一个颇为伟大的忠魂碑。这碑就建立在济南的，我们也该很注意了。据报上是这样记载的：……记者特往参观，地址在经六路济南医院后，四周筑有高五尺之围墙，院内庄约十余亩地基，忠魂碑在东南角，高可三丈，东北角筑一高亭，四周植松柏各种树木，大门向北，交叉日本旗本日本两面，省会公安局派定之商埠第四公安分局及保安第五大队，特

余的务队官长警察在门前后四周武装荷枪保护，计到……本市日侨两千人，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本市男女民众前往参观者达五千余人，全体日人行祭奠礼以后，并燃放焰火，炮声隆隆，火影腾空，旋在忠魂碑前表演其强健武力，掌声如雷……。

第二天又开运动会，因为下雨，我们底民众及××也在那里冒雨参观，报纸上也很有劲，都是用大字在第一段登出来。

我对于济南好像没多大关系，那些名胜有的去过，有的只能够见到照片，对于日本侨民却还能认得出：因为在济南是很好认识的。

虽然在济南已经住了四年多了，对于济南的认识还是颇为模糊，自己总是想多认识她一点，在各处去发掘，去发掘黑暗层的人们底事情。

一个人下了车，无论是胶济或津浦以后，你便可以踏着新修完整的沥青路走了。修筑得的确很漂亮，皮鞋在上面走是最合适了。据说，那不但有一种好听的声音在脚底下发出来，而且还格外觉得舒服。

济南，这华北的都市，在马路不平，电话不灵，警察不行下经历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她已经成为一个华北的大都市，在两条铁路和黄河的联贯下，我们底都市渐渐地好起来了；站在千佛山或城头马路上可以看到向突飞猛进的路上走的房子。在平时颇为荒凉的经七路一带，现在也完成了民房的建筑，自来水在修筑，农村的人在往这儿跑，朋友，济南马上便可以成为一个华北的更重要的市镇。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惊奇说这里的经济权大都操在日本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狄 克（即张春桥）

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

——约瑟夫——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底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致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底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底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

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批判了苏汶底理论，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但是，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甚至就没有作，也是没法否认的事。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底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或者说：为了要鼓励作者，对于他们严厉的批评，是不合适的。或者说：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然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

是的，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们应

当加以鼓励，应当加以慰勉，然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例，头些时候青年诗人×××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大家忘了批评他，如何呢？他没落下去了！再看《雷雨》作者底单行本序文，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意见。他已经在自傲了！假如他底《雷雨》发表以后，就得到正确的批评，那是不会有这现象的。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列的几点好处：

（一）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则写另外一部，（二）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三）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

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

张春桥向鲁迅反扑的信

敬爱的先生：

头几天，偶然地到新钟书店去，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里面有先生底那篇《三月的租界》，是关于我的。这使我心里不安好几天了，经过几天的思索，我才写这封信给先生。

关于我那篇文章，所以要写它，是由于当时读到《新文化》以及其他刊物上对于某些作品的忽略或批评的不够，先生知道的，是一片“好心”。我希望我们底批评家多作一点工作，对于作者读者都有益的。

固然在这连投枪也很少见的现在，对于《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是应当给予最高的评价的。然而，敬爱的先生，我们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就是不能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制出以后我们是不是又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他呢？如果说要的话，我底意见便在这里。我希望这投枪更加尖锐、雄壮，绝没想把它折断。对于田军象对于每个进步的作家一样，我是见着爱护心的。写那篇文章，也仍是由于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但是，先生，对于“田军不该早回来”这句话我并不是盲从，是有理由的，现在却不必说了，因为他和肖红已经回来了，从那血腥的世界跑到这个血腥的世界里来了，而又献给了人们《八月的乡村》这部书，我还说什么呢？说出来，只能使我们当中有了误会

和隔膜。——我认为现在还没有什么误会太大的地方。

我的要说的话，似乎就是这些。总括一句就是希望先生能够明了我底原意，虽然《三月的租界》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我也不想说什么了。只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安心。同时，我还有许多意见告诉田军，也想在下次信里说。

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

祝福你的健康！

(原信存上海鲁迅纪念馆)

也是文学管见

狄 克

四月六日的《言林》上，西华先生在《文学管见》这题目下写的文章是犯了错误的。他跟那些自居“前辈”的人一样，说什么“倘使这个时代真的需要某种文学，能够把握现实的作家，他们的眼光要比空口呐喊的人尖锐得多，他们早已埋头在稿纸上用工夫了！用得着你说吗？”在西华先生看来，文学是用不到批评家的。

这原因是由于西华先生的整个的错误，他对文学的估计，还是以个人主义的“自我表现”出发的，他认为理论限制了一个人的自由，我想关于这一点，西华先生可以把文艺自由论战的文献找来看一下，就可以明白自己的错误。而且根据文学史来说，理论家的地位，很重要，他们可以指导作家的错误。

比方“国防文学”的提出，他一方面告诉这时代需要什么文学，一方面唤起没有注意这问题的人。西华先生，你能说它没有用处吗？

再说西华先生，你如果认为理论没有用处，你还写什么“管见”作什么？“用得着说么？”先生、理论是取消不得的！

（1936年4月11日《立报》）

纪念九一八

张春桥

这些时文坛上的纠纷（本书编者按：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真叫人不能容忍。大家也都好像听其自然，解决这纠纷不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在今年我们纪念九一八的时候，我代表千百万的读者向理论家要求，迅速开展猛烈无情的论争，批评自己的错误，接受朋友底意见，使这论争早日结束。

我们不能容忍目前这状况，只能使敌人易于进攻，使自己底读者陷于头疼的状况。

（《文学大众》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9月）

（《文学大众》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9月）

（《文学大众》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9月）

韩复榘

韩复榘是个什么人

去年，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集体的写过一册小说：华北事变演义。在里面，我把韩复榘写成一个对抗战有决心的人。我也就在这种信任底下，回到山东。当然我更相信的是山东的民众。但是，我错了：韩复榘使山东落在敌人手里。

我是了解韩复榘这个人的。他脑子里很复杂有时候是农民的天真，有时候是腐烂与愚蠢。本来他是从农村出来的人，“老粗”，很天真的；加上以后生活给他的思想，就成了这样：他很简单，也就很容易地上敌人的当。并且，一直上当到底！

有一件事情表现出他很天真，一种农民的习气，很象苏联的英雄却派也夫同志。不过，却派也夫同志得到了正确的领导，而韩没有得到。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一个济南师范的学生酒醉以后闯进山东省政府，要见韩结果被韩打了一个嘴巴。第二天，韩把济南师范校长找来，“进行谈判，”认为自己是错了，“心里很难过。”要这位学生打他一个耳光。不然，就得接受韩的二百五十块钱。（在山东打嘴巴叫作打二百五。）这就是他原来的面目。学“施公”“包公”底“私访，”自称“韩青天，”是这一根性的发展。所以，他可以化很多钱征求飞檐走壁的人材；相信梁作友那样的骗子；相信相面的，

自己也给人相面，所以他常常闹很天真的笑话，遇到复杂的环境就头晕脑涨，也就因为这样，他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底当。——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促成的。

可惜的是，我从济南退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出更多的材料，更充实我底说明。只能在下面补充。

山东在全国抗战以后的环境

我们都知道山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九一八”以前，每年成群结队的人“下关东”，根据邮局的统计，只是旧历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就有三百万元从东三省寄回来，（带回家的不在内）使得山东很“富足。”

山东过去是在敌人底支配下，铁路，工厂，矿山，……底股票多半操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没人用最低的工价购买被农村破产推出来的劳动力，又用引诱人们吸“海洛英”等等手段把工人完全变成奴隶，而且使得劳动者一代一代的被奴役。

为了镇压中国的革命，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经直接用武力屠杀山东同胞，造成五三惨案。

“九一八”事变以后，山东在接连的水灾里，人民底生活就更苦了。一个农妇告诉我说：神不保佑我们，叫我们受苦，弄得没钱烧香，他能怪谁呢？

如果在这里作民运工作是可以展开的。因为敌人底侵略给我们造成了许多有利的条件。虽然，北伐军到山东的时候，因为国共两党分裂民运工作没有作得好，虽然，山东过去离皇帝很近，后来是被军阀统治着，被麻醉得很厉害，虽然因为这些原因山东民众失去了“强有力的”自动性。

“八一三”后全国抗战发动了，韩复榘不应当起来准备作战吗？——青岛随时都有发生战争的可能的。自然，应当准备的，就是一个封建军阀吧，为了保守自己底地盘也应当准备作战的。何况韩复榘有过很好的表示，象对西安事变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优待东北大学南下请愿的学生等等。又何况这时候全国上下都在蒋委员长领导底下对日作战了呢？

韩复榘怎样办的

敌人在河北作战的时候说：只打二十九军。进攻太原的时候说：只打山西以便进攻红军。自然啦，是不打山东的。你看，青岛是平安无事的。据说：敌人还答应韩复榘他存在日本银行的钱，在中日战争结束以后仍旧归还。

于是，韩复榘就平安地在济南作皇帝。他好象不知道这话是假的，而且非常相信。冯玉祥先生去津浦线指挥作战的时候，他不听指挥，李宗仁先生要求换防也未能圆满解决。

我们住在济南的人，真是“幸福，”敌人底飞机不断地来，却从来没投过弹。去年九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的时候，我很“恐怖：”济南很和平。到后来，我对于山东军政当局不敢信任了，不但我，都知道韩复榘已经成问题。虽然，韩在自己底报纸上怎样宣传自己底决心。

这时候，韩把少爷送往香港，太太送往西安，并把没带走的衣物等等，送往曹县，派国术家保护着。

象连阴天样倦人：韩复榘预备怎么办呢？

飞机来，不轰炸。有一次，丢下一枚手榴弹，济南防空司令部底高射机关枪向敌机射击，事后，韩发脾气：越打越轰炸！敌人更聪明：当晚北平广播电台向韩道歉！以后，敌

机真没有轰炸过，丢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传讯的铅筒，内容据说是“荒谬的信件。”另外，土肥原贤二，这个日本流氓到过济南没有，也是值得注意的。

敌人尽量的玩手腕，来骗他。他也就被骗到底。已经到沧州了，政训工作还不曾作，韩说：战事到鲁境还不迟！已经到禹城北部徒骇河了，他相信敌人只打山西，不打他；津浦线只有敌人几千人，他放着自己底十几万队伍不反攻。等到敌人占领太原后来攻他，他就会把四五万人丢在黄河北岸炸毁洛口铁桥。这时候，该知道敌人不是不打他了吧，他却又相信起敌人不过黄河！听说，他每天请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替他算卦，结论是“敌人绝不会过黄河！”好吧，不过来就好。

“政训处长是共产党！”是济南各机关的人都知道的，为了防止政治工作人员的活动，他一方面派人下去监视，一方面下命令说：不准作任何党派活动。政治工作人员到农村去受到各方面的阻碍，不是无因的。这里，他是皇帝，国民党的同志们也不能自由地工作。别的人，一直到后来枪毙人的时候，连汉奸在内一律称为“反动分子！”

政训处的同志们把济南的日本财产没收并分配给民众了，韩说：他不负责。北平广播说：济南侨民财产被抗日分子及共产党没收了。

“天下太平！”

隔着黄河双方互相攻击着，炮声每天不断。敌机来，不轰炸，所以也不发警报。“幸福”的人们，每天在街头逛戏院里人挤不动，济南是太平的。所以连保安队也用不着了。韩为了补充

自己在黄河北岸的损失，缴了枪改编成他底补充团。他忘记了济南距离前线只有十几里，汉奸随时都可以暴动，使济南陷落这还不算，他把几县的人民自卫枪枝也没收了。那些带枪来的壮丁呢，放在最前线，他自己底实力却调在后方休息。

民众们都想起来，在最初。后来，他们想说：“日本人来了，也不过这样吧！”他们日日夜夜地受着扰害。虽然他们也知道还有好的军队，也是中国军队。他们有自己枪枝，在鲁西，每县平均有五六万枝枪，很多是过去从军阀军队中里夺来的。但是，有些作政治工作的只是为了吃饭，逃难，（跟着军队容易跑）他们眼里没有群众，他们把群众看得一钱不值。有的想作，又怕“党”“派”的帽子落在自己头上！

大家只是等着敌人来，他来，咱们就走！

我想起普里波衣的小说“对马”来，普里波衣同志写出了沙皇海军的腐败，我觉得第三集团军的某一部分人比他们还腐败些，怎么能够跟敌人作战呢！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而且一直退到兖州，使敌人威胁到战略的中心——徐州。

枪毙韩复榘

退出济南的时候，我是知道济南要失守的，除非枪毙韩复榘，彻底改造第三集团军或由别的有力部队接防。这是经验，冀察政权存在的时候，冀察两省的同胞不能进行武装对日战争，现在却可以了。同样的，在韩复榘这样的汉奸卖国贼底统治之下，民众也不能进行武装对日战争，事实也证明了我底话：合众社底消息说：山东已经发展了一百万人民自

卫军！现在韩复榘是枪毙了！这一点证明了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也证明了蒋委员长为了对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决心改造已有的军队，就是说：在现在军队的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军！我们拥护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底判决，并且要求把同韩复榘一样的汉奸卖国贼处决，不要使他们混在我们底阵线里！

我们想一下，芦沟桥事变以后因为政治上的问题，使军事失败的事实吧，宋哲元，刘汝明，刘多荃，万福麟……等错误底，是我们最痛苦的回忆。我们不应再该犯同样的错了。

我们主张：“甲，在各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达到下列目的：（一）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二）改善军民的关系；（三）改善官兵的关系。乙，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教育与纪律，统一的装备与供给。丙，改善军事技术与指挥。丁，倍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改善与扩大军事处政治的学校。戊，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

希望继续韩复榘领导第三集团军的孙桐萱先生和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先生将军队和政府机关提高得更适合于战时，把山东已失的地方收复过来。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
（原刊汉口《战地》第一期，1938年3月20日出版，错别字一律照旧）

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

——上海南京路印象

张春桥

到过上海的人，没有不到南京路的。没有到过上海的人，只要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也不能忘记南京路。为了掌握祖国的命运，我国人民曾经在这条路上进行过多少英勇的斗争呵！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舰队停泊在黄浦江上，用大炮对着南京路，他们在外滩修了坚固的高楼大厦，好像主人似地住在那里，指挥着他们的走卒，榨取着中国人民的鲜血，自以为他们真的掌握了中国的命运。但是，中国的真正的主人，我们伟大的人民，并没有被屠杀吓倒，就是在这个城市，在帝国主义大炮射程以内的一座狭窄的弄堂房子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组成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英勇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这个光辉灿烂的难忘的年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斗争的结局。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那些急风暴雨的日子，我们还记得很清楚，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进上海的最初几天，都是在屋檐下度过的，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暖干了淋湿的军衣，和那些带红臂章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们，肩并肩地守卫着这座城市。

今天的南京路上，每天每天照旧拥挤着数不清的人群，

虽然马路已经拓宽了不少，仍然显得十分狭窄。但是，连许多老上海人也不能不说南京路已经变了。许多早年到过上海的外国朋友，他们到上海访问的时候，本来以为可以替同行的人作向导的。走到南京路一看，才发现自己也不能不找向导了。特别是这几个月，南京路上的变化尤其快，不但国营商店照常拥挤着来自各地的人们，原来的私营商店也天天像过年节一样，张灯结彩，鞭炮声连续不断，公私合营的喜报贴满了明亮的玻璃窗。它告诉人们，不要多久，南京路的面貌将要更加不易辨认了。

看到这种变化，我们每个人都高兴。那些盼望着社会主义早一天来到自己身边的工人们，那些曾经埋怨着在私营商店里是埋没青春的店员们，更是高兴。永安公司的一个青年职工，听到公司被批准公私合营的消息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正在生病，马上赶到公司，把橱窗擦亮，货物摆齐，他要使顾客一进门就觉得公司变了样。有一个造漆业的工人，过去被人家称作“算盘珠”，意思是拨一拨，动一动，现在他说：“企业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一定要像个主人。”是的，如果过去他真的像一个算盘珠的话，现在他再也不会像一个算盘珠了。觉悟了的工人们是那样爱社会主义，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但是，为什么资本家也接受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他们为什么“不怕共产”呢？他们真的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公民吗？这许多问题，在党的文件中，在科学家的论文中已经作了科学的论证，不久以前，我曾经参加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许多资本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给他们指出的道

路是完全正确的。

许多资本家都讲到：他们从来是相信钱的，以为钱能通神，谁有了钱，谁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能够掌握子孙万代的命运。他们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按着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老步调走着。他们满以为可以吃尽虾米，变成大鱼。他们中间也确实有不少是肥壮的大鱼，是经过风浪的胜利者，但是，他们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在鲜血淋漓的斗争中被咬得遍体鳞伤的。

永安公司是全国知名的。据这家公司的资本家郭琳爽说：“我的上一辈，在海外经商，同其他侨胞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当时满怀着振兴实业的心情，盼望着祖国的强盛，”一九一八年上海开设了永安公司，一九二一年创办了永安纱厂。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些愿望呢？永安纱厂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六年先后遭受到英国、日本棉纱倾销的打击，几乎垮台。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掠夺。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王朝也没有给他们带来繁荣。这个公司，除了百货商场长期地推销外国产的高级消费品以外，还开设了酒楼、茶室、咖啡室、旅馆、戏院、弹子房、跳舞场、溜冰场、游乐场等等，完全是为当时享乐至上的寄生虫们服务的，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在这些场所腐化堕落。什么“振兴实业”，“祖国强盛”，早已不知道丢到几个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为了追求厚利，连亲戚朋友的情谊也置之度外。郭琳爽说：“在旧上海大马路上的四大公司，都是我的同乡和亲戚所开的（先施公司经理是我的连襟，大新公司经理是我的妹夫，新新公司经理是同乡），但因为同行关系，在见面的时候，大家只谈谈客套，敷衍敷衍。在背地里派人去暗中调查

商品价钱，互相削价倾销，他们卖一块钱，我们卖九角钱，并且用大减价、大贱卖的号召，争夺营业，还挖用对方的女销贷员。”就是这样，他们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以为日本不敢同美国作战，为了防止日本侵占企业，曾向美国注册，冀望保护。但是在上海沦陷的时候，正因为挂了美商招牌，反而被日本侵略者派驻了监督官，管理企业，把我们公司的全部现金，搬到台湾银行去，我们想支付一块钱，也要经过日本监督官盖章批准。”郭琳爽在回顾解放以前的三十年的过程以后，感慨万分地说：这就是永安企业的惨痛的命运。

有同样遭遇的，难道只有一家永安公司吗？翻开每一家民族工商企业的历史，哪里又能找到一个例外呢？更多的是，还没有经过一两个回合，就被“大鱼”吃掉了。

只有到了解放以后，当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他们才有了出路。

当然，不能设想一个资本家会同工人一样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真理。这不是改头换面，而是脱胎换骨，长时间的彷徨、怀疑、动摇，多次的反复，这是不可能避免的，很多资本家，在解放前夕，手里拿着飞机票，坐卧不安，夜以继日，有一个资本家说：“那时，我怕共产党，想离开上海，可是，从家里跑到工厂，从这个车间，到那个车间，东看看，西看看，怎么舍得这些工厂？想到自己是中国人，怎么好离开祖国当白华去呢？”他终于留下来了。解放初期，他对人民政府是半信半疑，又怕又喜。信的是人民政府说到做到，疑的是人民政府会不会管经济；喜的是祖国一天天进步，怕的是个人没前途。他们不愿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他们要继续走

资本主义的道路。一九五二年初开始的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整个局势起了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飞跃发展，国营企业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迅速到来，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一切阵线上的伟大胜利……这一切都迫使资本家们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命运。还是听资本家本人谈一谈他们的思想变化吧。公私合营上海振华造漆厂的私方代表姚粹良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说：“通过六年来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而且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事例，使我的半信、变为全信、半疑变为不疑，可喜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怕的念头逐渐消除。先从我们的国家地位来说，由于我和我的家属在海外居住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所遭受到的痛苦和折磨也特别多，我自己因为在菲律宾马尼拉上岸的时候，没有准备好保证金，就被美国人关进了水牢。我的爱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新加坡的时候，被英国人抢走了随身的首饰。我也曾听人家对我说，新加坡总督请客的时候，中国领事排在最后一个位子。现在如何呢？周总理足迹所到的地方，人民夹道欢迎。我们的外交人员受到了人家的高度尊敬，我们的侨胞受到了祖国的保护，过去不吃香的中国货，现在各国人民争先购买。这都不是偶然的。再从我们国内建设来看，辉煌的成就，数也数不清，真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拿我们自己的工厂来看，解放以前，烟囱上做了乌鸦窝，机器长年睡觉。现在烟囱里冒着浓烟，机器经常开动，工人们的勤劳智慧，正在创造着无穷尽的财富。”

拿我个人来说，解放前管理的厂只有十几个老年职工，我被人称为养老院院长。现在全业合并合营之后，厂里的职工将要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人。我在公方代表领导之下，负责管理厂务，还担任着行业的工作。以我的家庭生活来说，只要拿爱人的几句话，就可以说明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她曾经对我说：‘过去你在外面不称心，回来就要发脾气，你在外面称了心，我又要替你担心。现在事情这样忙，倒很少看见你发脾气，我也不用替你担心了。’这几句话说明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要比过去有意义多了。我的子女，在学校里念书的，不是青年团员，就是少先队员，大家为着一个目标而工作着，学习着，没有三心两意。我的眼光放大了，放远了，又有什么可疑，什么可怕呢？”

刘鸿生是一位年老的资本家，他是许多企业的创办人。当他的儿子问他是不是真的拥护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回答说：“我看见比我老一辈的有钱的家庭，总是一代不如一代。父亲发财，儿子抽鸦片、吃、著、嫖、赌样样都来，到了第三代，孙子就做了瘪三，这种例子很多，很少有钱的家庭是例外的。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企业。都经过克服困难，走向好转。企业公私合营以后，你们都做了企业的干部，你们的子女，好多已带上了红领巾，将来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团员党员，决不再愿做资本家了，他们也不会要你们的股票的。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大家有工作做，大家都能过幸福的生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手里所执有的东西实在是太渺小了。将来国家又富又强，每人有他的一份，我自己的一份就会比我现在手里所执有的要更可靠。因此，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这些话，是一九五五年底说的。解放初期，他们不会这样说，说了也不见得是出自真心。现在，他们这样说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从亲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付出了许多痛苦的代价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长期教育下得出来的结论。

我们工人阶级为了解放自己，就必须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只有消灭了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才最后地打碎了自己身上的锁链。只有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阶级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根据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绝大多数资本家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逐步地和平改造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可能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新胜利。

南京路上有一座庙，现在还有极少数人在那里烧香磕头，他们还不知道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希望万能的神仙给他们指出一条可靠的幸福道路。我们工人阶级不是依靠神仙，而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找到了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道路，并且告诉一切人们，只有这一条才是万代幸福的道路。现在，资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劝导，愿意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愿意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们的伟大的胜利。虽然他们中间还有人表示犹豫、动摇，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用更多的、更艰苦的工作，使那些动摇的人逐步地“摇”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的。

历史的脚步迈得这样快，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知道又有多少工厂商店实行公私合营了。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一

天比一天更多地把握住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必须继续帮助他们前进，扩大进步分子的队伍，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双重改造。按照工人阶级的理想和目标来改造我们伟大的祖国。

让几十年来仁人志士们在南京路上喊过的口号更加响亮起来吧：社会主义万岁！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

（刊于《人民文学》1956年2月号，收入

《今朝集》改名《南京路上的杂感》）

坚持工农兵方向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党中央邀集延安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上作了讲话。当时，我在敌后，不在延安，直到第二年，一九四三年秋季，才看到这篇讲话稿。我还记得，那时的晋察冀边区，正在进行残酷的反“扫荡”战役。敌人的几万部队在中心地区反复搜“剿”，没有那一条小山沟没有这群野兽的足迹。战役进行了三个月。整个根据地变成了兵营，人民就是军队，军队同人民在一起，坚持着英勇的斗争。记得是一个出太阳的早晨，我们几个人一个小组，刚刚转移到河北省和山西省交界的一座大山上，恰巧遇到了一个领导机关的队伍，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本油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是初冬天气，河里已经结冰，山坡上还长着没有来得及收割的庄稼，远处炮声隆隆，还偶然听到几声枪响，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洼，坐在茅草堆上，读这篇讲话。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呵！就是在这次反“扫荡”前不久，我们曾经为当时文艺界的许多问题争论过，但是有许多问题找不到一致的看法。现在，在残酷的战斗中，听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确了应当、也必须坚持的方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该是多么高兴。后来，我们在反“扫荡”战役中，遇到很多人，除了谈敌情、谈工作，谈得最多的，也就是这篇讲话了。

时间过得真快，这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情，却已经过去将近十四年。现在，我们要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周年了。

十五年，在人类历史上简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光荣的十五年。我们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这短短的十五年里，迈开英勇的步伐，跨过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跨了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又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真正的黄金时代。

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切大变动的明显的结果。如果说，十五年前，还有人看不清楚工农兵在我们国家里的地位，在实际上还把工农兵看得不那么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生活的面貌已经根本改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些曾经妄想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们，已经被推下了政治历史舞台，工农兵已经牢牢地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在今天，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还有什么人呢？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官僚资本主义被打倒了、封建地主正在改造成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正在改造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经过将近八年的自我改造，他们的多数正在为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生活着、劳动着的，是它的真正的主人：工人、农民、士兵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人，正在改造成为劳动者。

在这样的条件下，再来讨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应当是容易得多了。我们的文艺，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不为工农兵服务，还能够为什么人服务呢？不是工农兵方向，还能

搞个什么方向呢？那些曾经横行一时的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不是去追随那些已经死去了的幽灵，而是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生龙活虎般的服务对象，能够找到的，只有那些登上了这座历史舞台，正在朝气蓬勃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这就是工农兵。不论写文章，画画，唱歌，演戏，如果不打算给工人、农民、士兵欣赏，不打算给他们的干部欣赏，就很难找到“知音”了。不是说一个也没有了，而是说连那些“知音”也正在变化。这种趋势，今天已经很明显，将来还会更加明显，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在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然是人心不齐的。我们看到，有些人，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已经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了，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员，他们在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他们同工农兵同甘苦，共呼吸，心心相印，血肉般密切联系，不可分离。也还有一部分人，同上面说的就不同了，他们看到工农兵就不顺眼，听到“为工农兵服务”就摇头，他们同工农兵离得很远，到目前为止，也还不大愿意缩小这个距离。这两种人，都不多。我们中间，人数比较多的，恐怕还是处在这种状态：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很愿意为工农兵服务，但是同工农兵之间还有一个距离，还是两片，还没有打成一片，或者还没有完全打成一片，这正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灵魂的深处”，也就是说，在思想的深处，还有那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虽然他们很不愿意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帽子”，实际上他们又很留恋这顶帽子的温暖，有的人甚至以为这个王国以外都是冷酷无情的。有时候，也下了决心，从这个王国的宝座上走下来了，到工农兵中间去

转一转，但是，遇到什么稍为不如意的事，或者看看比在花园里散步累得多，就又回到这个宝座上去休息了。比如说，写一些东西吧，因为本来对工农兵就不熟悉，连半个知心朋友也没有，“体验生活”，“走马观花”，写得自然不好，或者枯燥无味，被称作“公式化、概念化”了，这时，他不是下决心深入到生活中去，而是两手一摊：“看，我说过吧，写工农兵，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然后，两手一背，向后转了。这样的人，有的过几天又下来了；有的下来以后也就再也没有回去，在工农兵中间找到了知心朋友，乐而不返了；有的经过好多次反复，扭扭捏捏，不大痛快。这种种情况，极为复杂，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的趋势，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多的人们，愿意、或者更坚决地同工农兵接近起来了。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却还需要一个长时期，一个长过程。

文学艺术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主要是靠他的作品。有一个时期，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发生了一些误解，好象为工农兵服务，就只能写工农兵，演工农兵，好象工农兵只应当、只能够、只需要看工农兵自己，就好象人们每天洗脸照镜子一样，“目不斜视”，看到的只有自己，别的东西都不能看。有的人甚至觉得，工农兵只配看点粗浅的东西，向工农兵说话，就象同矮子说话一样，得弯下腰来。还有人生怕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叫工农兵看见了，会传染上病菌，不敢“百花齐放”，唯恐长出杂草。也有人以为“工农兵方向”已经过时了，根本用不到这个、那个方向，根本用不到提倡什么。谁要是立志描写工农兵，那也就等于立志“公式化概念化”，谁如果提倡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那就是妨碍了作家的自由，

等等。当然，在我们国家里，在我们人民内部，文艺工作者到不到工农兵中间去，写什么，怎样写，都是有自由的。但是，事实上，工农兵并不是那么“枯燥乏味”的人，他们不但需要了解本阶级的生活，也想知道别的阶级的生活；他们不但喜欢看描写战争和生产的作品，也愿意看看描写儿女情、家务事的作品，他们甚至很愿意跟着孙行者，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到天宫或龙宫去“体验生活”一番。特别是今天，他们担负着治理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使命，要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很想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知道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将来，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好的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不但创造新经济，也要创造新文化，创造共产主义的灿烂的新生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旺的方法，就是从各方面满足工农兵群众广泛的文化需要的方法。所以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是限制了、缩小了作家、艺术家的活动范围，而是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任凭作家、艺术家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方法，把自己的全部天才贡献给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英雄——工农兵群众。

当然，因为我们的队伍还不是那么整齐，贡献出来的有香花，也有毒草，还有一些一时难以辨别的東西，这是很自然的。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比如一些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东西出来了，经过大家一讨论，“呵，原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这样的呵。”人们就增了知识，长了见闻，这对工农兵也有好处。那些不要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如果真的写出来一些作品，我们也是要看的，为的是多懂得一些事，加以比较，以便改善自己的工作，在比

赛中，胜过他们。

但是从总的趋势看，坚持工农兵方向，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人，还是越来越多的。我们都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但是我们常常还做得不好，或不够好。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不论是写重大题材，还是写家务事，儿女情，都不能不联系到这个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不是短时期内能办得到的。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可以轻易地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作家、艺术家是否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这个主要的标志就是看它是否已经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看他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程度，也就是说，主要地不是看他读了几本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是以是否加入了共产党作标准。我们看到，有些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士兵同志，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英勇奋斗，奋不顾身，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有的人读了不少马克思的著作，甚至能够成篇的背诵，但是，同工农兵群众却是格格不入的。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却是一个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们有些党员，正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要得到这一套，就要不只是从书本上，而且要在工农兵群众中，在火热的斗争中学习，锻炼。长期地学习，再学习，

锻炼，再锻炼。它只能是一个自觉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过程。别人的帮助，只能属于帮助的性质，不能代替，不能强制，也不象缺钱用的时候，可以向别人借、或者别人自动帮助你一笔款子那么简单；学习有一点成就，也不象积蓄起一笔钱放在银行里，可以随时取用那么方便。如果停止学习，以前的种种积蓄，是可能在一个晚上统统不翼而飞的。“活到老，学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我们前辈们的话。既然已经有许多我们十分尊敬的同志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他们的样子，努力地得到“那一套”呢？

这些年来，每次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感到那上面的话是针对今天的自己讲的。它象不锈钢铸成的一样，过了多少年，仍然明亮发光，照耀着我们，启发着我们。今天，在我们祖国、在我们国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后，再来读它，一方面感到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是越走越宽广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把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力量更充分地调动起来，把我们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推进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新阶段，心里实在高兴；另一方面，又深感这十五年自己的进步仍然有限，经常感到思想落后于实际的苦恼，同工农兵群众的联系也还很不密切，写这样一些话，作为鞭策自己的纪念。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深夜记

(见《今朝集》)

把根扎深一些

张春桥

亲爱的同志：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离开这个城市很远了。今天早晨，那时你还没有走，响了第一声春雷，下了那么一场好雨，天气清爽极了。可以想到，你从车窗里看到的江南的田野，比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春天景色，会更加迷人。按时间计算，你现在已经过了南京，轮渡正载着你们越过长江，或者已经到达对岸。想到这里，真是羡慕你。这倒不止是因为你碰到这么好的天气，你知道，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个作家倘若能够到他所喜欢的地方，长时期地在那里生活下去，成为那个地方的人民的知心朋友，那该是多么幸福。现在，你终于带着户口转移证走了，这无论是对你自己，或者是对于象我这样的关心你的读者和同志，都是一件头条新闻，值得高兴。何况，我也是一个希望能够出去跑跑而经常机会不多的人。因此，虽然知道，我所说的话，可能都是你知道的，甚至你比我有更深刻的感受，但是，止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我还是想写这封信给你，一来是向你祝贺，二来是表示今天没有到车站送行的遗憾，三来是把我们没有谈完的话继续下去。

最近这些天，我们都在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正象大家所说的，这

个讲话，对于我们的国家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工人、农民、士兵，还是作家、艺术家，都是太重要了。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总是那样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把千千万万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调动起来，为实现下一个任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这一次，我们受到的教育，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胜利，这是无可怀疑的。

我们常常谈到，“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每天都很忙，恨不得天天都是四十八小时，许多人都是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日，工作一个接着一个，从年初一忙到年三十，时间飞速地过去，而事情还没有办完几件。抗战八年，觉得长得很；全国解放眼看就是八年了，却觉得快得很。事情发展得是那么迅速，甚至连我们的异常敏感的作家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预言式的诗篇，而新闻早已变成旧闻。我们翻开几年前的那些还没有变色的报纸，上面登着的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几年了。特别是到了一九五五年，这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决胜负的年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象大海里的浪涛一样汹涌澎湃，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的祖国面貌刷新一新。有一位同志说得好，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是革命的“连锁反应”，幸福的“连锁反应”，它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以超过一般人预计的速度向前发展。六万万人民，也就是世界上每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地球上这个地区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来了一个大变化，不但国民党早已下台，人民政府早已上台，地主倒下去，

农民站起来，而且，实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理想，从根本土废除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亲爱的同志，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我们不但是这一切事件的见证人，而且是自觉的参加者。我们都有自己的兴奋的不眠之夜。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我们对这一切，都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呢？记得我们曾经谈起过，我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象一个不高明的猎人，箭还没有射出，鸟儿已经飞过去了，刚刚搭上第二只箭，第三只鸟儿又已经飞远了。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内部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后，我们的思想就更加感觉到跟不上了。变化是这样大，说它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前所未有的，是一点儿也不算夸张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前进是前进了，却进步得比较慢。在观察当前的现实生活的时候，感到吃力得很，还常常不对头。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感谢党中央，这样及时地给我们指出了关键所在，并且给了我们打开这些重要关键的钥匙。

这样的情况，对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来说，已经是个问题了。你，一个作家，感觉到精神上负担很重，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文学作品，被人民当作生活的教科书，虽然有人说“不会为了听政治报告才去看戏”，但是，不是吃饱了闲得慌，而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些精神上、思想上的营养，才到处找文学作品读的，却大有人在，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我们是党教养大的，党不但让我们在实际生活的激流里学习，也让我们从文学艺术作品里学习。我们，作为文学作品的读者，是多么热望能够从我们的作家们的作品里，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我们人民的英雄的历史，创造性的劳动，灿烂的未来。我们要知道一切，一切都

想知道。在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和学校里，你到处可以看到这样渴望着的诚恳热情的读者，他们的眼睛，信任地盯着我们的作家。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提出了不是完全合理的要求，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里的生活，在你的作品里没有反映出来呢？”亲爱的同志，你是了解的，他并不知道，并不是任何一位作家，都可以写出任何一种作品来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今天的读者早已不把作家看作外人，而是当作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当作自己认识生活、改变生活的教师。正因为这样，你，一位作家，就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感到自己在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上很吃力，感到脱离生活的苦恼，更是可以理解的，何况现在现实生活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记得上次你从乡下回来，你就已经讲过，过去熟悉的东西，现在已经变了。农民组织了生产合作社以后，甚至用的语言也增加了不少新东西。在我们住了这些年的这个城市里，变化之大，也是人所共见的。我们曾经谈起过，我们面前摆着那么多的前辈的作家们根本没有碰到过的新鲜的、尖锐的问题。在党委的会议上，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实际生活里所发生的，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有些问题很费脑筋，常常为了一件看来不大的问题，反复地讨论了好多次，还找不出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最近，我还听到这样的事：有一位党委书记，工作是做得不坏的，近半年来却深深感觉到新问题太多了，用过去习惯的一套办法去解决，都是行不通的，他很烦恼，想回到他所热爱的农村去工作。不久以前，从外省来了一位作农村工作的同志，是老战友了，大家谈起来，原来农村里有同样多的新问题，并不比城市里简单些。这样

一来，我们这位党委书记，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直到最近，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才懂得了这个道理，原来是自己没有看到这个大变动，还不懂得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新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亲爱的同志，你说，在实际生活里，只有这么一位党委书记吗？据我看，绝不止他一个。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大变动中间，不是也碰到一些烦恼吗？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大家在伟大的胜利面前变得愁闷起来了，我们是过得快活的，而是说，在办事情，或者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感到没有把握，提起笔来有些沉重，或者写了，发表出来，却受到批评，心中有些不知所措，或者叫做“不摸底”。我们有时很想摸一摸领导的“底”，希望从那里找到几条这样那样的“观点”，这自然不能说不对，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向老水手请教，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是向领导请教。但是，我们总不能样样都靠上级呀，上级也还要靠我们呀。我们总不能老是作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呀。老是随着东风、西风左右摇摆，遇到一阵旋风就头晕眼花，这种日子也太难过了。当然，就是一棵树，一棵不是长在墙头上而是长在大地上的树，当它还很幼稚的时候，也会东摇西摆的；一棵老树，当它的老根腐朽了的时候，甚至会经不起一阵轻风就倒掉。但是，去年夏天，上海遇到十二级台风，不是有百分之三十的树木被吹倒了吗？那百分之七十却没有倒掉。我们也应当象这个百分之七十一一样，把根扎得深深的。一年做不到，十年；十年做不到，再花十年。祖国大地是不吝啬的，生活是不吝啬的，它给了我们充裕的空间，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根可以扎得深而又深。根深了，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摇摇摆摆了。

把根扎在什么地方？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曾劝过一些朋友，也劝过你：把根扎在上海吧。上海太重要了。我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不了解上海，他就很难了解中国社会。这里曾经集中了中国最黑暗、最丑恶的生活，也曾经诞生了中国最先进、最光明的力量。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一代，多么需要知道历史上发生在上海的斗争。我们多么希望有一批作家，在这个城市里定居下来，花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系统地深刻地去调查研究这个城市的丰富的生活，写出这个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城市生活。时间是不留情的。现在生活在上海的，还有那些参加过历次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的老工人，还有那些熟悉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的资本家，还有那些曾经横行一时的海上同人，还有那些熟悉每一座大楼历史的看门人，提篮桥监狱里还关着一些作家们不能不知道的一些“大人物”，一些刽子手。谁如果想写表现近代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不熟悉这些人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动手，将来就不大容易看到这些活的人物了。当然，一个作家要写什么，这是不能勉强的。你说，你还是想去写你熟悉的东西，我也是赞成的；因此，你选定的“落户”的地方不是上海，我也是赞成的。但是，我还是抱着上面说的这么一个希望。我也还希望你有时候来上海看看，即便你是写农村生活，或者写抗日战争，了解一下上海，对你也会有帮助。我总觉得，我们的生活太狭窄了。有的人只有那么几个熟人，如果欣赏一下“往来有鸿儒，谈笑无白丁”的“高雅”的生活，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是，要想写出大一些的东西，只有那么一点点生活是无论如何不够的。就是写工农兵，不熟悉工农兵的敌人和朋友

也是不够的，因为工农兵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这也是我劝一些朋友定居上海的一个原因，这里是太丰富了，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啥有啥”。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曾经对“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这篇文章加了这样的按语：“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我们需要找的人物是太多了。

说了这么一通上海，并不想动摇你的军心。我不是一个唯上海论者，而是一个题材广泛论者，祖国大地，海阔天空，任君选择。我们作读者的，是既愿意看英雄史诗，也愿意听一曲抒情小调的。我们喜爱香花，也愿意见识见识毒草，虽然没有谁愿意被老虎吃掉，连小孩子也喜欢斗一斗动物园里的老虎的。我说这么一大篇对你来说也许是不关重要的话，是希望你到了新的地方，象你打算的那样，把生活的圈子放宽一些。写新生活，要知道旧生活；写历史，也要知道现在；知道黑暗，就更加热爱光明。只知道一点、一面，对于一个作家是太不够了。当然，你的经验比我多，我并不劝你写英雄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写一个叛徒，或者劝你采用其他的公式。

现在正是春天。农民们是当年就见收成的，作家却要难得多，有时候要几十年的辛勤劳动，才有收成。因此，我没有那么性急，也希望你不要性急，不要以为等到秋收时节，你不能象农民一样传出丰收捷报，我们会怪你。现在确实有人责备作家，“为什么不能写出伟大作品？”“为什么我们写不出《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种渴望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也不是一年两年写出来的，人类历史上多少年才出现了一个曹雪芹、一个托尔斯泰？何

况我们面对着的是这样复杂的崭新的生活，我们要认识这种生活，又要能够掌握卓越的技巧，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用这种话督促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见得有用，责备那些辛勤工作的作家则未免过份了。当然，对你，一位作家来说，如果经常考虑到人民的瞩望，加紧鞭策自己，也有好处。我和你同样地希望，有更多的人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到沸腾的建设热潮中去，把自己的根扎得深深的，那时，我们描写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大师们就会多起来了，我们就能够毫无愧色地答复这种责备了。

在这条路上，还有不少的困难。我想，你所说的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有时自己还留恋那个高雅的宝座，特别是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一种有力的诱惑的时候，很容易回到这个宝座上去，这是实情。但是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依靠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这就是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同工农兵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彼此是知心朋友。你不是讲过，每当同劳动群众在一起，是他们中间的平等的一员的时候，同他们不是“你们”、“我们”、格格不入，而是分不出彼此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感情就少了吗？那就让我们经常地处在这种高尚的生活中间吧，让这种感情变成统治一切，把小资产阶级王国的那个宝座彻底地排挤出去吧。我相信，你是可以作到的，正如同别的同志已经做到的那样。那时，我们就更有把握地庆祝你的丰收了。

祝你一路平安！

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深夜，上海。

（《人民文学》1957年5—6月合刊）

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

自从《文汇报》《戏剧》副刊发表了杜宣和吕复两位同志关于上海话剧剧目问题的文章，《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发表了章柳同志的《百分之零点六说明什么问题》以后，关于现代题材的剧目问题，引起了争论，并且从话剧方面扩大到了戏曲方面。

现在，上海戏剧界的同志们，受到祖国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鼓舞，大家兴高采烈，干劲十足，要使戏剧艺术也来个大跃进。人们希望这个争论早点有个结果，以利于跃进。

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准备探讨争论中所涉及的一切问题，比如戏曲艺术中现代题材的表演问题，那是应当由艺术工作者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实践才能解决的。我只想对当前比较迫切的几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意见，向同志们请教。

杜宣、章柳和其他同志提出现代题材剧目问题，是从繁荣戏剧艺术的热切愿望出发的，这是应当首先加以肯定的。他们分析上海剧目的现状的时候，承认上海话剧“整个剧目倾向基本上是健康的”，上海戏曲“大部分是健康的”。他们认为上海剧目中现代题材的剧目少，戏剧团体“不愿意”或不热心上演现代题材的剧目；他们大声疾呼地要人们注意这个

“令人触目的”事实，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他们为了强调自己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对有些情况的分析，就未免太简单了。比如，在分析话剧剧目的时候，他们把所有剧目分为“外国剧目”、“解放前剧目”、“现代剧目”三大类，三类的含意不明，界限也不清楚，又没有对剧目的内容作具体的分析，这就很难说明什么问题。比如，苏联著名作家拉甫列涅夫写的《决裂》这出戏，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来衡量，都应当列入优秀剧目的名单，而杜宣同志简单地按照作者的国籍，把它划入“外国剧目”，用来证明上演这出戏的单位对当前的现实斗争不热心，这怎么能够叫人心服呢？

又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这是上海唯一的专业话剧团体；他们上演剧目的状况是有代表性的。一九五七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八个剧目，有五个是反映我国现代生活的，一个是反映保加利亚的现代生活的，另外两个是《日出》和《复活》。此外，他们还演了十个苏联话剧片断，也是反映现代生活的。单从剧目看，很难说已经构成了不愿演现代题材剧目的倾向。

又如，对于戏曲，章柳同志不充分考虑剧种的特点、剧团的特点，笼统地用加减法算一笔总账，得出现代题材剧目只占千分之六或百分之零点六的数目字，除了使人乍一听到，确实有吓人之感以外，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要说明问题，就需要作系统的分析，至少要算一算几年的账，看一看历史发展。可惜，到现在，我还找不到系统的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从不完整的材料看，这两年，戏曲剧目中反映现实生活

的剧目比以前减少了些；但是，几个过去经常演“现代剧”的剧种，并没有经常不演。在各个戏曲剧种上演剧目中，现代题材剧目是不是只占千分之六，这个统计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即使只占千分之六，我想仍然应当首先承认戏曲工作者已经作了一番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我们还很不满足。

总的看来，上海剧目的情况是好的，是健康的。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不但应当继续整理、挖掘传统剧目（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已经作得很好了），还应当继续努力，多多创作和演出新的剧目，特别是反映我国人民现实斗争的剧目，使这方面的比重逐渐增加，使整个剧目更加丰富多采。由于话剧比戏曲具备更有利的条件，各个话剧团体应当作更大的努力。戏曲团体首先是老国家剧团，也应当大胆创造，使戏曲艺术不断前进。如果杜宣、章柳等同志是这样提出问题，我想，会得到更多的人的赞成，会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对情况的分析太简单，对成绩估计不足，在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忽略了其他方面，就不免使人们感到心情极不舒畅。我们在提出问题的的时候，为什么不采取更能鼓舞人心、加强团结、促进艺术繁荣的提法呢？我想，这应该当作一个教训：不但要有促进的愿望，而且要有适当的方法。

党对题材问题的政策，我们有必要重新温习一下。在提出多多创作和演出反映现实斗争的剧目的时候，我们应当不要忘了大局，忘了总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抓了这头，忘

了那头。关于题材问题，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讲话里，曾经作过明确的说明，重读一下，就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我希望那些认为不出现现代题材剧目好象就不能为工农兵服务的同志，很好地注意这一段话：“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文艺既然要为工农兵服务，当然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同时也要批评旧社会和反面人物，要歌颂进步，同时要批评落后，所以文艺题材应当非常宽广。在文艺作品里出现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历史上有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等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文艺作品可以写正面人物和新社会，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和旧社会，而且，没有旧社会就难以衬托出新社会，没有反面人物也难以衬托出正面人物。因此，关于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党的政策是这样明确，看来是不需要再加说明了。我只想请我们上海戏剧界的同志们回想一下过去几年的情况：凡是坚决地执行了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时候，我们的戏剧运动就活跃起来，观众、剧团、剧场，皆大欢喜。相反的，凡是执行得不坚决（不是不执行，而是不坚决）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吃苦头。这段经历，我们是不应当忘记的。

在今天，当我们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前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当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呢？毫无疑问，不但今天，我们必须长期地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也只有坚决执行这个方针，才能调动一切力量，使成千成万的戏剧工作者鼓足革命干劲，努力地改造自己，发扬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项标准，发扬各个剧种、剧团和所有艺术工作者的长处，上演各种有益于人民的剧目，让现代题材的剧目同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一起来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服务。我们没有理由只允许这部分剧目、而不允许另外一些剧目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跃进。我们并不是没有这样的经验：仅仅是强调了某些方面，而不注意其他方面；虽然我们的同志并不反对“百花齐放”的政策，但结果却是只有一花或数花怒放，并不是百花怒放。这一个教训，我们也不应当忘记掉。

这样说，是不是我们就无所提倡了呢？当然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大家都看到的，我们的党历来提倡作家、艺术家描写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作家、艺术家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在作品的取材上，在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应当有完全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去描写各种各样的题材，创造性地多种多样地处理同一种题材。但是，既然我们承认工农兵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英雄，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使工农兵的伟大形象在文学艺术里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不但是这个时代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也是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共同愿望。在这方面，他们会遇到各种

困难，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需要各方面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大家都看到：党和政府对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性的劳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给予最大的支持。不但当他们取得那怕是很小的成就的时候，大加奖励；当他们失败了的时候，也大力保护，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在今天，当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人物、新事物正在每天每时地诞生和成长，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如果真正想把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推向前进，更应当下定最大的决心，发挥最大的创造性，超过我们祖祖辈辈的文学家、艺术家，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创造出灿烂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想到这些，想到我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成就，再想到我们剧目的现状，对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可以自满。确切地说，我们实在感到惭愧。虽然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还很年青，在工作中还有种种困难；虽然不应当对各个剧种、各个剧团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为了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人民，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一切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努力地做到了。最近时期，各个剧团鼓起了干劲以后，剧本也有了，人材也有了，过去不敢打破的陈规打破了，许多困难一个一个地向我们低下了头，这就恰好证明，我们在过去确实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在这方面，文艺工作的领导机关负有更多的责任，吕复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文章，在肯定戏剧工作的成绩的时候，对这方面缺少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容易使人安于现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点。

现在，大家鼓起了革命干劲，正在创作各种题材的新剧目，其中，反映我国人民现实生活的新剧目，受到了更大的重视。戏曲方面也在作各种大胆的实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当然，我们不止是鼓励和支持反映现实斗争的剧目。我们也不能强制谁一定要写现代题材的剧目。社会主义的春风，对一切在政治上有利于社会主义、在艺术上能够感动人的作品，都提供了生长的机会。那些在政治上、艺术上成就高的，当然有更好的成长机会。但是，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应当、也不可能温室中成长，而只能在竞赛中、在斗争中成长。既要同毒草作斗争，又要同各种香花作竞赛。我们有些同志很怕现代题材或其他新创作的剧目比不赢，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个竞赛的裁判员是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古今中外不知道出现过多少种剧目，最后留下来的只有这么多，这难道还没有证明人民群众是严格的裁判员吗？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今天的人民群众，朝气蓬勃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群众，会比我们的祖先作出更公正的评判呢？

许多同志在文章中批判了那种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的现象，这是正确的。在戏剧工作者中，确实有人单纯追求票房价值，他们的口号是：“为人民币而奋斗”，还有许多人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仍然很浓厚。但是，应当公正地说，他们不但以票房价值来衡量现代题材的剧目，他们同样以票房价值来衡量其他题材的剧目。他们甚至曲解“百花齐放”的政策，把毒草当作香花。他们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当然应当反对。不反掉这种思想，不但现代题材的剧目，我们整个戏剧艺术的繁荣，都要受到破坏。为了反对这种思想，我们有

些同志喜欢拿“现代题材的剧目上座率很高”这个论点作斗争的武器，我看这并没有多少力量。因为对方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驳我们，虽然驳不倒我们，却容易把我们也拉进以票房价值衡量剧目的泥坑里去。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为什么服务这个基本问题上来解决。只要他们把他们的口号去掉一个“币”字，把“为人民币而奋斗”，变作“为人民而奋斗”即“为人民服务”就好办了。这当然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任务。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洗礼，我们戏剧工作者的大多数，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正在高涨起来，他们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的艺术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使我们确信：紧跟着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大跃进，一个新的艺术上的大竞赛，一个新的艺术上的大跃进，已经到来了。

四

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欢迎许多剧团制定大跃进的规划，欢迎他们在规划中所采取的革命态度，欢迎他们大胆地创造各种题材的新剧目，欢迎他们努力地去表现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也欢迎他们整理优秀的传统剧目。

当然，这个大跃进还在开始，我们会遇到各种意料到的和没有意料到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有一股社会主义的干劲，任何困难都不能吓倒我们。只要我们决心作艺术上的革新家、艺术上的闯将，正象许多艺术家所表示的，既然前辈艺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韧不拔，兢兢业业，克服了难以忍受的困难，终于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共产党教养下的

新中国的艺术家，就一定能够做出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辉煌的成就。

成功的保证是彻底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戏剧工作者。不论是创作新的、还是整理旧的，我们都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了今天的和将来的人，而是为了工农兵，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只有懂得工农兵，只有把心完全交给党、交给工农兵，同工农兵完全打成一片，才可能搞出真正为工农兵喜爱的东西来。我们所以相信我们的戏剧艺术将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代，正是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人决心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工人阶级的艺术大军正在形成和壮大起来。

同志们，让我们干起来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开展友谊竞赛吧！让我们比一比，看谁为工农兵服务好，看谁在繁荣社会主义艺术的大跃进中占在上游！

附记：这篇文章在三月初写成以后，曾经征求过杜宣、吕复、章柳和上海戏剧界一些同志的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谨向他们致谢。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刊于1958年3月23日《解放日报》，亦见《龙华集》）

张春桥其它文章中的 反动言论摘录

【按】《失业的人》是张春桥三十年代写的
另一首黑诗，竭力歪曲失业的劳动者的反抗斗争，
宣扬自发性和盲动主义：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钱，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们的饭。

春桥：《失业的人》，《新诗歌》二
卷二期，1934年7月6日。

士撰《济南晚报》副刊《新村》，编者韩啸声，内容有文坛、影坛、剧坛、影评等，剪自上海小报，故多不可靠；此外尚有章回小说：《电影血》（娟姊著）、《杨小三》（舒瘦绿著）、《小苍桑》（舒瘦绿著）、《××奇侠传》（舒瘦绿著）、《大被套》（小红著）、《霓裳艳影》（毒虫著）、《情蹤幻影》（颐君著）等；为本市小报中之历史较好，内容较佳者。

张春桥：《济南底报纸副刊一瞥》，

《中华日报》1934年8月7日。

【按】在《驱逐》这篇黑文里，张春桥竭力污蔑农民运动，鼓吹阶级调和，把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斗争说成是形成所谓“匪患”的原因，把灾民写成小偷：

在我们故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古代的风味。在那里含着蕴着一团和气，不过，人的天性是斗争，和气的时候是他们，和别人用举重的器械激烈的斗争的时候也是他们。在曹州永远肃清不了的匪患是这种情况之下形成的。【按】

张春桥：《驱逐》，《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9期，1935年7月。

这群难民（指1934年因黄河决口逃荒到城市的穷苦农民——编者）却没管这些，他们是饥饿的，他们底肚子还空着。

……在市场上偷窃的事情也添了。

……正计划着怎样拿走前面那个人的皮包。

……近来街市上都是他们的足迹，而且还存有偷窃的行动。于是驱逐他们离开这地方了。

张春桥：《驱逐》，《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9期，1935年7月。

我们知道，他（指胡适——编者）曾经赞成过李顿爵士的报告书，也曾赞美过某大酒店的设备，最近又是劝学生复课，又是希望什么什么。过去，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他的地位，作了官，成了学者，……

（他的过去，是曾经对的，对于他本身说，他曾乌鸦似的让封建社会烦恼过，……

狄克：《老鸦与胡适》，《知识》第5号，1936年2月1日。

“我常听老人家说，以前的时候，就没有过这样坏的世界”

道，也许那是为了有皇上，可是关东有了皇上，……许多老乡在那里当了土匪，……”

张春桥：《草原之歌》，《申报周刊》第1卷第

8期，1936年3月1日。

【按】 张春桥歪曲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阐述的思想；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之后，又一次攻击鲁迅。

某先生（指鲁迅——编者）否定了非常时的文学，他说非常时没有文学，他的意见已经有人反驳过了，这里还是归结到非常时是需要文学，有文学的。尤其是诗歌，在现在顶需要。

狄克：《革命的诗歌》，《立报》1936年4月8

日。

谁也知道，汉奸必须杀——没什么客气。因为他们背叛了民族国家，来毒害同胞。但是，那些无知的人，他们为了生活，平常又不知道作汉奸就是该杀的人，我们更用另外一种方法对付他们。

张春桥：《怎样对付汉奸》，《立报》1936年4

月8日。

尤使人高兴是……《包身工》（夏衍著——编者）……他把中国报告文学底内容跟技术都扩大，提高了。

张春桥：《光明》，《东方文艺》1卷第3期，1936

年6月。

今天，你们能休息一天，在每日劳十三小时的生活里，得到一天休息，真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你们却不，一定要让我在今天的聚会中讲一讲我们在今天作些什么，决定今年

生活底路……

你们……把我当作“先生”，……

你们说：你们将把你们底那些故事，告诉我，让我写出像你们爱读的《母亲》那样的书，并且，马上告诉我一个“父亲”的故事，说，写出来是一样感动人，教育人的。

张春桥：《生活吧，迎着春光——写给你跟我自己》，《申报周刊》1937年3月。

……我们作老百姓的必须严密注意：我们不但要注意小侦探，小汉奸，我们还必须注意那些隐藏得很周密，不容易察觉出来的大汉奸大间谍……。

不过，这只是民众能够辨得了的，还靠我们抗战的政府，……。

张春桥：《枪毙间谍》，《立报》1937年8月10日。

他们（指日本侵略者——编者）一方面屠杀；一方面防止我们计划的抗战。前方，屠杀；后方，捣乱！在中间还想法引起我们老百姓跟政府的分裂，地方跟政府的分裂，使我们后方工作完全没法开展，使我们不能组织自己，训练自己，在政府统一指挥下抗战！

张春桥：《别动队来了》，《立报》1937年8月21日。

同胞们应当自动地组织起来，接受政府的领导，并请求发给枪枝，开到前线去，或者在后方服务。

我们必须使全国各地点燃起抗战的火把，随时随地都有在政府领导下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武装部队，别动队，游击队，

来歼灭敌人……。

张春桥：《武装民众》，《立报》1937年9月3日。

我们的武装战士都是在一个伟大的炉子里锻炼出来的，一切中华民族的雄壮美丽集中在他们身上了。

张春桥：《中国为什么胜利的》，《国内通报战时特刊》1937年10月。

在苏联，虽然敌对阶级消灭了，但是，苏联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影响，讽刺就成为打击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最有力的武器。

张春桥：《我们领会的‘真理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见《新华月报》1954年第5期185页

“五四”运动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所走的道路，就是红色专家的道路。

张春桥：《论十年树人》，见《人民文学》1957年第12期第1页

我们民族的戏曲遗产是那样丰富，每一个剧种都有成百上千的传统剧目，虽然不能说每一出戏都是好的，但总是好的多于坏的，精华多于糟粕。

张春桥：《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见《今朝集》24页

我们的文化艺术既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就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忱地描写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所喜爱的优秀作品，使我们的作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但是，有些人对这个总方针发生了若干误解，好象为工

农兵服务就只能描写工农兵；好象工人、农民、士兵只愿意或者只应当在图书、舞台、银幕上看到自己，不愿意也不应当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各个阶级的复杂的生活；好象今天要“除四害”了，图书、舞台、银幕上只有描写“除四害”的东西才有现实教育意义，描写别的生活，描写旧上海、旧社会、描写历史就没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从这种误解出发，有些人就随意地给自己或别人立了一些清规戒律，这个不好写，那个不好演，许多剧目就这样没有分析地自动地不演了；或者看到某一篇未必正确的批评，某个权威人士未必认真思考过地“摇了摇头”，就不再演出了。这样，我们一部分作家，艺术家走的路就越来越窄，书上、舞台上、银幕上描写的东西越来越单调。不少剧团演出的剧目贫乏无力，质量很低，观众不愿意看，只好经常换新节目，新节目是赶出来的，质量越来越低，观众越来越不欢迎，上座率越来越低，形成了不能忍受的恶性循环。

张春桥：《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见《今朝集》第24—25页

我们的文化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发展生产服务，这个总方向是早已确定了的。实践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

张春桥：《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见《今朝集》23页

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而产生的。我们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

主义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却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需要产生的。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我们在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中，所着重解决的，就是这种先进同落后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做是阶级矛盾，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

张春桥：《关于杂文》见《龙华集》第53页

当我们读到白石老人那些充满革新精神的话，看到他敢于轻视古人，“我行我道，下笔要有我章法”，敢于设想“吾有独到处，如今昔人见亡，亦必钦佩”就更加感到暮气非彻底烧光不可，就更加感到：在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决心大变”的闯将呵！

张春桥：《“决心大变”颂》见《龙华集》第

72页

（张春桥《杂文》第四二五—）

江青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演员独白（节录）

蓝 苹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人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因此问题发生了，虽然我们妇女们应该感谢易卜生给了我们一个勇敢的娜拉，可是易卜生却没有说及娜拉出走后的问题。试问，娜拉离开了家庭是不是就不被人玩弄了？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人？让我拿我离家后的生活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做过书记，教师，并且有一个时期我差一点做了女伶。……

（一九三四年《娜拉》演出特刊）

为自由而战牺牲

蓝 辛

真是怪事！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是不喜欢自由的。尤其是称为万能的人类，有时竟为争自由牺牲了性命。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好象是一个五月天气。舅舅特地从乡下赶来，送给我一个很美丽，名字叫做金铃的小雀子，因为那种雀子叫起来象铃一样的清脆动听。我快活的不知怎么才好，忙着弄这个、弄那个给它吃，可是这个可爱的小东西不但不吃，而且满笼子飞扑。母亲等舅舅走后，逼着我放它。不过，那时候我任性的很，哭着，闹着不许放。可怜的小东西，在我家过了一夜就死了，连水都没有喝一口。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太残忍了。剥掉了它的自由，最后逼它走上死路。

一个雀子尚且为求自由死了，那么人，尤其是受着重重的束缚的妇女，当然更应该勇敢的去争取自由了！《自由神》可以说是我们妇女争自由的一段纪录。在那里边我扮演一个女兵，她就是为争自由而牺牲了。但是这种牺牲并不是个人的，无目底的，而是世界上所有妇女的牺牲。牺牲的代价——最后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美国有一位历史家房龙先生，他写过一本名叫《人类自由思想发达史》的书。他似乎把历史看成了一部自由思想发达史似的。虽然他的见解有些片面，但是大体上我认为是对

三八妇女节

——要求于中国的剧作者——

蓝 苹

真所谓三句不离本行，我是一个演员，因此在“三八节”所说的总离不了戏剧。

一九三五年上演的《娜拉》，以及最近上演的《大雷雨》都是以妇女问题做主题的戏。并且在演出上也有着很大的意义。

可是在目前中国的妇女，不仅仅象卡嘉林娜似的，被封建的铁蹄踏践着，而且没有丝毫保障地，在时时被帝国主义者欺凌着。如不久以前，一个少妇在电车上被某国的水兵强吻了，以及过去报章上常常登载的，某某厂的女工被××工头给强奸了调戏了……这一切的暴行，我们都是毫无抵抗的忍受着。我们是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底下活着。象这样，单单一个出走的娜拉够吗？不，绝对不够！我们需要比娜拉更实践，更觉醒的妇女！

《娜拉》和《大雷雨》同有着一个缺点——就是因为风俗和习惯的不同，不够通俗，就因为这样，一般的观众不容易接受。所以我们需要通俗的，为大多数观众能够接受的创作剧。可是创作剧呢？不能说没有，如夏衍先生的《赛金花》，《秋瑾》，曹禺先生的《雷雨》和《日出》，以及其他的独幕剧，这都是很有意义，很优秀的创作。但是我们还

是觉得不够，不够！

站在一个妇女和演员的立场上，我要求剧作者，在今年，在这被称谓话剧年的一九三七年，大量的替我们，被窒息将死的妇女们产生剧本！

三八节的前夜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时事新报》)

“四十年代”与“业余剧人” 争演赛金花纠纷的经过

“业余”招待记者解释一切

〔编者按〕一九三六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决定第三次公演“国防文学”的黑标本、吹捧汉奸妓女的《赛金花》一剧。江青（蓝苹）当时十分醉心于赛金花这样一个反动腐朽的角色，让唐纳为她争演此角色。当时另一女演员王莹也争演赛金花一角，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剧团分裂成“四十年代”和“业余剧人”两个团体。从下面这个材料中也可以看到江青争演赛金花这幕丑剧的一个侧面。

在今年六月中，业余剧人便有公演《赛金花》之议。他们团里有蓝苹，胡萍，王莹，郑君里，赵丹，施超，金山等这么多人材，但因为觉得赛金花这一角儿，团里的任何女演员都不能胜任愉快，因之，就登报公开征求赛金花的扮演者。

好容易，业余剧人找到了适当的新人了。在这时，金山、王莹等忽然退出业余，另组四十年代，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与金城订了公演《赛金花》的合同，然后再以“既成事实”要求业余放弃《赛金花》。于是，纠纷便起来了。自然，这里面还有其它枝节，使这纷纠一时无法消灭。

曾经由欧阳予倩居间调解，但因为四十年代坚持王莹饰赛金花而未果。

最近，因为纠纷越来越深，几乎形成对垒的局面。而在不久之前的“旧剧座谈会”举行之后，四十年代的导演委员之一曾同业余负责人一度商讨，大家认为有来一个“联欢会”解释一切的误会的必要。

后来“联欢会”是决定十五日午在扬子饭店举行的。但临时四十年代却推诿事情忙而不参加。

为了要使外间人明了这件事的纠纷经过，业余剧人那天在大东茶室招待记者。列席的有：赵丹，蓝苹，郑君里，唐纳、陈鲤庭以及各报记者等二十余人。

关于“他们演赛金花”的态度，业余剧人表示，他们不反对演反帝的戏剧，而且极力主张促进国防戏剧运动，愿意帮助新人来干戏剧运动，可是，他们不同意吹捧个人，以及用营业的手段来干戏剧运动来吹捧个人，至于《赛金花》，他们老早已打算上演，但是在相距不远的时问，同一地方上演，这很费人力，财力的戏，在整个戏剧运动上总是浪费。可是这次浪费却已成事实……

并且把几个月来，关于这事的经过，一一举出，同时还纠正了外间的谣言。

最后，他们说：因为四十年代刚刚演过《赛金花》，他们不打算马上接上去演，但也不放弃。他们现在决要排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和章氓译沈西苓改编的《醉生梦死》。

然后再演《赛金花》，日期暂定下月中旬，地点在“金城”或“卡尔登”。

（《电声》第5卷第47期，1936年11月）

见闻偶记

——蓝苹将演赛金花

么 哥

在四月号的《文学》上，有夏衍先生的剧作《赛金花》刊载着，都是在现在正在大声疾呼之“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的挺可宝贵的收获，那是最足以用事实来塞住讥笑者的口的收获。

自《赛金花》和读者见面之后，很引起文坛及文学爱好者的注意，尤其是在戏剧界，在现在还不满一月的短短时间中，听说便有许多团体都想来排演它。

有许多团体要排演它，那自然是好现象。但限于场面的伟大，角色的众多，所以有许多团体便因为经济及人材的不够，而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许多心余力怯的团体中，比较具体地有实现希望的，便只有蚂蚁剧团。

蚂蚁剧团以前曾演过好几次戏，成绩虽不能算怎样的好，但认真的态度却是够使我们佩服的，所缺少的，便是没有好好的导演人材，能够统率这些戏剧爱好者。

现在，他们决心来排演《赛金花》了。排练的费用预备二千元，以便在布景、道具上都不致太寒酸，因而失去真实性。至于赛金花这个角色，则预备请蓝苹来担任。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绩，现在来扮演《赛金花》，想来成绩当也不致错的。

至于导演等人材，则也想向外界聘请云。

（《时事新报》1936年4月29日）

蓝苹一九三六年参加为蒋介石 “购机祝寿”演出的情况

(资料)

一九三五年，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疯狂叫嚣“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加紧调动军队向我陕北根据地进攻。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系蒋匪五十岁生日，国民政府掀起了一个所谓“购机祝寿运动”，大肆搜刮，为蒋匪歌功颂德。

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指使下，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由反动青帮头子黄金荣等出面招集上海电影界人士，策划进一步扩大“购机祝寿运动”，会上决议由黄金荣主持推动在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游艺会演。六月十五日，各报曾发消息报导。上海文艺界右翼，随即发起了一个“上海电影界购机祝寿游艺大会”，组织一批电影界人员，于九月二十七日在金城大戏院演出，将所得票款献给蒋匪“购机祝寿”。购买飞机干什么？正象鲁迅揭露的那样：“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是用来屠杀革命人民的。在演出人员中，有以后成为戴笠小老婆的胡蝶，以及以后堕落为汉奸演员的袁美云、韩兰根、龚秋霞等。据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两天上海各报刊登的广告，这次演出“开幕时全体登台唱党歌(国民党党歌)”，鼓吹“电影界总动员”，“献机以厚国防”，并说这是“千载难逢”的“空前盛举”，竭力向蒋介石献媚。在这次活动中，蓝苹(江青)参加演出独幕剧《求婚》。

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漫谈“同”与“异”

——读书杂感

姚文元

阖上了《彷徨》，时间还只有九点钟，随手拿起一本《庄子集解》来翻翻。

《庄子》也真是一座闪烁着智慧的火花的宝库。其中好多故事，象“庖丁解牛”“七日而浑沌死”“涸辙之鲋”……等，那含义的深远，真令人惊叹作者思想的深刻。有些句子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索我于枯鱼之肆”……等等，早已成为许多人都熟悉的文章中通用的语言了。

这一回我翻到了外篇《在宥第十一》，忽然有一段话象剪刀一样剪断了这种心情，使我态度严肃起来了，虽是几千年前古人说的话，竟好像说到自己心里。那是这样一段话：“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

“世俗之人”是不喜欢听不同的意见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出乎众”的愿望。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出头，而不是追求真理。他们最好天下都“同于己”，清一色。

如何对待“异于己”的意见，实在是百家争鸣开展后的一

个根本问题。“世俗之人”容不得相反的意见，对待对方往往容易粗暴。或则一概否定，或则永远各执一见，使得不同意见不能从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当中完善起来。我想，我们应当坚持自以为正确的意见，但也应当努力消灭自己思想中这种“世俗”气，尤其应该记住上面一段话后面紧接着一句十分尖锐的警句：“夫以出于众为心者，曷尝出乎众哉！”

*

由于联系了实际，《庄子》读不下去了，却想到了同和异的问题。最近反对崇拜权威是很剧烈的，这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因为盲目搬用教条而吃的苦头是太多了，至于因缺少独立思考，随随便便人云亦云而吃的苦头，那就更多了。

这并不能怪名人，而应当怪那些以名为贵的崇拜者。对这种心理——姑且叫它拜佛者的心理吧，以后需要作不断的斗争。

但是，我觉得除了那种象披着虎皮的猫一样的假权威，或者欺世盗名的伪名人以外，凡是因某一行刻苦研究创造而被公认为权威的，我们首先要珍视他的成就，虚心向他学习。学习和崇拜不同，崇拜是把权威的话当作万世不变的教条，学习是切切实实地吸取别人或前人著作中一切正确的有益的东西，但自己有思考、有吸收、有扬弃、有创造。如果所有权威的著作都不学习，想在空地上用“独立思考”建立大厦，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因反对权威崇拜而连权威正确的话也不敢同意或应用，也未免因噎废食了。

谈到“同”与“异”，我觉得刘勰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在《文心雕龙》的“序志第五十”中讲到他对各派的意见时说：“有同乎前论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

一点补充

——与若望同志交换一点意见

姚文元

王若望同志写了一篇“步步设防”的文章（见4月26日文汇报），尖锐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党的方针，但是后半截又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但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这不仅因为教条主义思想有很深的思想影响，是“放”和“鸣”的拦路石，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区别许多人还不清楚，教条主义不经过反复的思想上的批判不会退出阵地；不仅因为庸俗机械论的文艺思想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市场；而且还因为不反掉教条主义思想就没有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教条主义的存在恰恰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立论的借口，不反掉教条主义就没有能力用说理的方法去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但对于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同样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而也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有分析的批评，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和顾虑，使他们心悦诚服地共同前进。目前对党的方针还有怀疑或不通的有三种人：一种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香花，宗派情绪很重，看不起别人，一听见“逆耳之言”或刺眼之花，就粗暴地压制和打击，这种人是少数；第二种是受

了某些庸俗机械论的影响，看问题简单化，不习惯全面的看问题，因此思想上不通或不大通；第三种是在新形势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对当前社会的大变动缺少了解，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政治上的极深远的意义缺少认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用阶级斗争时期的老眼光来看今天的新问题，因此思想赶不上形势发展。后两种是多数，很多基层的党员干部多半是第三类。这三种同党的方针都有矛盾，这是共同的；但在矛盾的性质上又是有区别的，我们应当针对不同思想，反复宣传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坚决贯彻大胆放、大胆争和大放、大鸣，深入地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指出它的危害，并使思想赶不上形势的人能尽快地赶上形势，而不是采用简单化的打击讥笑的方法（这样反而会阻碍矛盾更快地解决），也不是用一个片面去反对另一个片面。

正因为这样，我除了同意王若望同志的基本看法和不少正确的分析外，在有的问题上也有不完全同意的看法。我觉得在个别问题上，王若望同志也是比较简单化了一些，没有把问题解释得很清楚。现在我想作一点补充。我指的是“主流”和“基调”问题。这里我想先把《萌芽》第八期编者的一段全文引出来（王若望同志只摘了其中最后两句）：

“可是，我们不能不说，我们主张扩大题材，也反对‘只有重大题材才能写’的偏激主义者，但是，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却对它缺乏热情，漠不关心，在我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工业化建设的生动场景；看不到农业合作化对农村引起的巨大变革，对于身边琐事、单纯的爱情故事、风花雪月，随手捡来就写，我们认为这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从题材的广阔性来说，又是另一种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作品；

从教育意义来说，忽略了重大题材，也就相对的减弱了。我们再表明编辑的要求，我们不反对小说只描写身边琐事或只是爱情的故事，也不反对风花雪月的抒情诗，但应该有主流和基调。”

这段话主张刊物要有主流和基调，提醒青年不要沉醉于没有什么意义的“身边琐事”，青年作者要有热情去反映时代，这是对的，应当肯定的，但这段话也有因教条主义束缚而来的片面性。第一，它在选择题材上反对“只有重大题材才能写的偏激主义者”（这是对的），但在教育意义上却又以为重大题材减少了就一定会“相对地减弱”，这就缺少事实根据。例如象《李时珍》《宋景诗》这样的历史作品给我们的教育作用，就不下于某些重大题材，即使题材重要，如果写不好，同样会削弱教育作用。今天题材是广阔的，不能完全以题材的分配决定教育作用的大小，而要从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强度、从作品在人民心灵上起的影响来衡量。第二，把“重大题材”或“主流”和“基调”仅仅归结为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是不够全面的，而且容易产生机械的解释，例如反对官僚主义，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样是重大题材。我以为，“重大题材”是有的，但应当予以更广泛的理解，它应当是指我们在过去进行革命斗争和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比较重大的历史意义、比较深刻的思想意义或比较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题材。这样的题材，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现，可以是正面描写，也可以是侧面剪影。例如《同甘共苦》和《在桥梁工地上》，都相当深刻地刻划了人物在新旧斗争和个人生活中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并且通过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

题，也应当算在“重大题材”之内。最近一期《诗刊》上郭小川同志的《深深的山谷》，是一首值得引起文艺界注意的诗，它是写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理想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因不能解决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而终于幻灭、自杀的故事。由于作者的思想高度所带来的深刻的批判性，由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作者毫无掩饰地展开了严酷的战斗生活对人的考验，虽然在艺术上尚存在缺点，它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及革命干部仍有着较强的教育意义。这样的教育题材即使写的是知识分子，仍旧是“重大”的。第三，爱情故事和风景诗，也应作两面分析：一面指出好的爱情故事和风景诗在培养人民共产主义道德、热爱生活和满足人民的美感上能起良好的作用，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作品，现在这样的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低级趣味和损害人民的美感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客观存在的，“避”是一种不可能的空想。首先要放，大胆地充分地放，放出来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然后再有区别、有分寸地进行说理的、友好的批评。但编者的话中却只提到了一面，忽视了另一面。

王若望同志批评这段话，是对的；但他的批评缺少分析，在正确地批评不应将主流和基调机械地归结为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时候，没有明确地肯定刊物也应当有主流和基调。他说：“从一个刊物来看，预先规定了象他所要求的基调和主流，同样会排斥不属于他的主‘流’，但在艺术上却有一定成就的作品。”

这里很容易使人马上联想到一个涉及所有文学刊物的问题：去年年底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一方面强调了大胆放、大胆争，不要怕不同意见，要发表“尖锐地批评生

活中的缺点的文章”，要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粗暴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提出了刊物应当“有立场、主流和基调”，有自己的主张，并且认为“这种大胆放手的作法与一个刊物有立场、有主导方向并不矛盾”（见会议的“总结”和“会议纪要”）。——那么，是不是这个原则应当否定和修正了呢？王若望同志也许并不是这个意思，但人们自己却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应当解释清楚。

我们应当不怕修正已经在生活中过时的论点而提出新的论点，如果这个论点的确已经过时的话。“一家独鸣”过时了，我们就坚决以“百家争鸣”来代替它。但我认为：编辑会议肯定的原则并未过时，它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统一而不是对立的。刊物有立场、主流和基调，并不应当作为教条主义来反掉。不管你主观上愿不愿意，一个刊物总是有立场的。正好象人有阶级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不过立场不同而已。在人民内部，我们可以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不同立场、不同的主流和基调的刊物来争鸣，同一个立场中也应当有不同特色和风格的刊物。《中国青年》和《人民文学》，《萌芽》和《文艺月报》，都可以有也应该有不同的风格。我是认为文艺刊物应当站在党的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的，站在这样的立场的刊物就必须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一定有同刊物立场一致的主流和基调。把“主流”和“基调”仅仅理解成为那种狭义的“重大题材”是不全面的，对于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刊物，**基调和主流**，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本身便要求我们努力去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一种

客观存在，那么，刊物有主流和基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天下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基调的带政治性的刊物，《民报》和《新民丛报》，《语丝》和《新月》，都有自己的基调。今天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基调，事实上，就必然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调。问题在于：教条主义决不是工人阶级的立场，真正有立场、有主流、有基调的刊物，就必须坚决、大胆、放手、彻底地贯彻齐放和争鸣的方针，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只有在“齐放”中才能体现主流，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衬出基调，不然，没有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所谓“主流”和“基调”就是一句幻想的空话；没有支流和各种鸣声的存在作前提，主流和基调也就丧失了“主”和“基”的性质。《星星》多数的诗是好的，同时也放出了《草木篇》，这正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做法，我们可以也应当批评《草木篇》的错误，但不能责备编者这样做是错的。如果这样认识，“放”出来“鸣”出来以后再来分析 and 讨论，就不存在因有“主流”和“基调”就妨碍了“齐放”和“争鸣”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主流”在同支流切磋、竞赛当中不断壮大，“基调”在争鸣中越鸣越响亮。所以，认为有“基调”和“主流”就不能“齐放”和“争鸣”，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它会产生宗派主义地排斥，我们要坚决反对；认为要“齐放”和“争鸣”就必须把刊物有“主流”和“基调”也反掉，实际上就可能使刊物离开工人阶级的立场，这种观点，我也不能同意。

我自己的认识也是逐步发展的，对方针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的，自己深深感到还需要不断学习。以上看法如有不对之处，恳请若望同志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文汇报》1957年5月7-8日）

教条和原则（之二）

——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姚文元

不重视老作家过去的生活经验，这自该是一个错误；新作家旧的生活知识缺乏也确是一个不足之处，但是以此得出结论说：“让一个生活经验和一般知识都很欠缺的青年去下到那宏大历史背景和复杂关系的地方”就是一种“偏差”，认为青年作家开出来的花是“枝叶单调，花瓣简单，”那也未免太过分了。

一个人有许多生活经验，不能仅以年龄来衡量。生活是有广度和深度两方面的，青年作家在生活的广度方面是有限度的，因此应当虚心地向生活、向老作家学习；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因而对生活理解得很深，则是完全可能的。

例如，写《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同志，是一个长期跟战士生活在一起的青年作家。他可能对旧社会的生活不是很熟悉——照姚雪垠先生说就是一个“缺点”吧，然而他懂得战士的心，他熟悉战场生活，他在艺术上下了极大的苦功，他写出了《保卫延安》。这是一部概括了浩繁的战争生活、描写了从司令员到炊事员的各种人物的小说，不能说是“枝叶单薄，花瓣简单”吧！但是他写出来了。因为对部队中的生活，

他是了解得很深的。——但愿我们多有几个跟杜鹏程一样的作家。

今天写作的题材是应当广阔的——限定在工农兵之内是不够的。从古到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从五四到解放，从神仙到精灵，从官僚到资本家……各种人，各种题材，只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内容，都可以。但是，不管写什么，对于我们具有最重要、最有普遍的意义，到底是写新的、还是写旧的呢？我以为应当以写新的为主。我们还是提倡大家努力去写过去革命斗争和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变革，努力刻划出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这应当是创作的主流，这和提倡题材广阔并不矛盾。苏联文学四十年来走过的基本道路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伟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史无前例地写出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形成以及为创造新的生活而斗争的劳动人民的新人的形象。如果没有母亲、夏伯阳、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磨刀石农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幸福、日日夜夜、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等史诗般的作品作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而以写旧俄罗斯生活为主流的话，今天苏联文学就不可能获得那样高的成就。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必须在战斗的、沸腾的社会主义生活中汲取作品的素材，这是把文学发展推向新阶段的重要条件之一。

所以，提倡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但又提倡作家努力熟悉新生活，这和那种机械的“配合”任务根本是两回事，而是从历史的观点看文学的发展——也包括艺术上的提高——所要求的。但姚雪垠先生强调的却是熟悉旧的生活：“为着概括

较大的历史现实，为着塑造更丰满的典型形象，任何作者不仅要懂得今天的生活，而且要懂得昨天的生活。”这就未免有点头脚颠倒了！

一般说，能熟悉旧社会的生活比不熟悉旧社会生活要好得多。在某些作品的创作上也必须熟悉旧生活。但具体地说，则要看写什么。“任何作者”这“任何”两个字就失去了分寸。例如写儿童的生活，不“懂得”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的青年作家也可以写；如果廿年后的人写农村生活中新的矛盾，也并不一定要“懂得”地主如何剥削农民才能写。相反地，对于许多既使是在新时代中生长起来的作家，努力熟悉新的生活，倒是第一位的工作。

我丝毫没有轻视老作家过去的生活经验的意思。老作家过去的生活经验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轻视是一种错误，我只是说，单靠过去还不够，熟悉新的也很重要。巴金、老舍、曹禺等前辈作家都不以过去的生活为满足，他们深入了新的生活，写出了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作品，这种态度是值得所有作家学习的。在这里宗派主义的观点是极有害的，不管是歧视老作家或轻视新作家，我们都要反对。

（《文汇报》1957年2月6日）

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姚文元

星期天，我到大东南烟厂去玩，有个朋友告诉我：不久以前他们开先进生产者评奖大会，需要放一场电影，工会到市工联放映队去借《天仙配》，但放映队的同志坚持不同意。理由是：“《天仙配》缺少政治意义，不能配合先进生产者运动，所以不宜在评奖大会上放映。”虽经工会再三要求，仍遭拒绝，结果只好借了一个工人不太感兴趣的《街上足球队》回来。后来工会又专门组织一次《天仙配》的放映，那次盛况空前，票子卖出了一千多张，临时还不断有人要求进来看这部电影。

我不想说什么大道理。但这个情况反映出：有些人把“政治意义”理解得实在太狭隘了。工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越愉快，生产也会更有劲。但要使工人们有优美广阔的精神生活，决不只是几个大报告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并不能“配合”战斗任务，但在朝鲜演出后志愿军却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可见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要摆出一副“政治面孔”，要每个人吃饭看戏时都记住“我是为社会主义而吃饭”、“我是为提高阶级觉悟而看戏”，其实这是并没有什么必要的。文学艺术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从思想上教育人民的作用，但这种教育作用必须通过艺术的力量表现出来，通过艺术中所反映的生活表现

出来，而不是枯燥乏味的口号。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异常广阔的，决不能机械地说只有描写生产的戏才能教育工人，描写战争的戏才能教育战士，凡是用进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和某个角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艺术，都能对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欢《董存瑞》，也喜欢《天仙配》，就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可惜这种要每一场戏都“配合”生产任务的人，还不是个别的，说得严重一些，他们只懂得机器，只懂得口号，不懂得人，到头来还是影响了生产。

“了解人关心人”的口号提出很久了，现在关心工人的物质生活已引起了重视，但关心工人文化生活的却还很少注意到。这难道不是应该及早注意的事吗？

1956年9月（见《细流集》）

姚文元其它文章中的反动 言论分类摘录

(一) 以反教条主义为名， 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庸俗社会学的产生，还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

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投入了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巨大的思想斗争的暴风雨。大力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忽视政治的倾向。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些工作，就不会有今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但也不能不看到，除了确实存在的主观上的缺点外，在剧烈的斗争中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因素，有的人往往抛开了艺术不同于其它宣传工具的特殊作用，或者根本不了解这种特殊作用。不了解“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主席）。当他们用片面的观点要求文艺作品时，就对文艺创作形成一种沉重的压力，不少作家缩手缩脚，顾虑很多。某些作家自己也有意无意地降低了艺术创造的特殊要求和特殊规律，但求大体上能“配合”过去，就算好了。

姚文元《也谈庸俗社会学》见《人民日报》

1956年11月15日

在当前，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对创作就有着

很重要的意义。

姚文元《论“知音”》，1956年，见《细流集》第123页

正因为他（按：指鲁迅）的战斗是脚踏实地的战斗，在他同形形色色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敌人作斗争中，就始终贯彻了反八股、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姚文元《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1956年，见《细流集》第67页

鲁迅反对八股并不只是出于抽象的道理，而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正在迅速变革中的社会，死抱住“老调子”就压迫了新事物的成长。他说：“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什么？”如果不用新的，革命的观点来代替老调子，不用适合新形势的理论去观察世界，国家就会被老调子“唱完”。所以他主张革命的思想家一定要同顽固守旧的“老调子”作斗争，不断提出适合新条件的主张和见解，对于坚持唱“老调子”的人，必须予以尖锐的打击。

目前专门以“抄一通公式”来解决问题的文章并未绝迹，继续反对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八股，也仍然是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鲁迅的这些意见，就值得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和革命干部深刻地记取。

姚文元《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见《细流集》第68—69页

(二) 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竭力美化

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这一次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揭露，可以说是宣告了这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路线的最后的终结，也宣告了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后终结。此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文艺领域中当然还会存在，还会从各方面顽强地表现自己，因而文学领域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但从路线上来说，永远不可能再形成一条如此完整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同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相抗衡和争夺领导权了。……从今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将成为中国文艺运动唯一的一条路线，成为几千年所创造的民族遗产中的精华和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艺运动一切优秀成果唯一的继承者，在党的领导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照耀下，在反对修正主义思潮和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导向新的全面的繁荣。

姚文元《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
1957年12月，见《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292页

总之，我以为我们如果从思想上把反右派当作一场革命，当成中国消灭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剥削制度的最后一场总决战，那就会用新的眼光去观察许多问题，就会用革命精神去进行斗争，就会勇往直前地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中途妥协，决不草率收兵。

姚文元《从这是一场革命来看问题》见《解放日报》1957年8月15日

现在还存在阶级斗争。……但是，在这场思想斗争中，胜利的一定是社会主义文艺，而且已经是社会主义文艺了。

姚文元《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见《上海文学》1961年第11期第53页

少数人把权和钱统统捏在手里的时代是永远地过去了。现在钱的魔力小得多了。劳动人民开始按照劳动的好、坏取得自己的钱，资本家也在一步步朝这个方向变化。劳动得好钱就多；劳动得差，钱就少。钱已经从剥削的手段转变成衡量劳动的尺度。

姚文元《人和钱》见《解放日报》1956年12月

4日

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总是集中在最根本的问题上。……

自然，我们在批判这种思潮的时候，也不能过分地夸大它的影响，以致没有看见马克思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好作品仍是我们的基调和主流，没有看见文学事业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重犯过去有些同志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力量和过低地估计无产阶级力量的错误。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

见《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第110页

（三）攻击和诋毁鲁迅

鲁迅逝世前那一段短时间里，胡风、冯雪峰等进行了恶毒的挑拨，企图利用鲁迅来分裂进步文艺界。由胡风、冯雪峰挑起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其目的就是企图削弱、破坏文艺

界的团结。鲁迅当时在病中，对有些情况是不清楚的。然而，尽管他们用了种种挑拨离间的手段，捏造了诽谤革命同志的事实，使鲁迅不能了解有些事情真相，甚至误解，使他心中很不愉快，但终掩盖不了上述的鲁迅真正的立场和观点。经过反胡风斗争和反右斗争，已经把胡风的罪恶活动和冯雪峰蒙蔽鲁迅，敌视、打击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反党活动，揭露得很清楚了。

姚文元《鲁迅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见《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第134页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鲁迅前后期的文章，就会发现有明显的变化。前期很多文章都是个人生活出发，从个人生活中的感受引申到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这也就是瞿秋白同志所说的通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方法，其中自然也有不少个人的生活琐事。

姚文元《鲁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士》
见《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第144页

对于孔子、孟子、庄子……等古代思想家及许多大文学家的著作，他（按：指鲁迅）读得非常多，研究得很精深，可是他决不持全部否定或无批判地接受，而是用正确的观点加以分析批判。在《现代的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他就曾指出孔子在活着的时候还是吃苦头的，他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的著作中有好的地方，他被捧作什么“大成至圣文宣王”是死后的事。

姚文元《刻苦学习，永远前进！》见《细流集》
第78页

(四) 吹捧叛徒、机会主义者

瞿秋白同志是第一个估定鲁迅的杂文的伟大的革命作用和历史地位的人，也是第一个科学地分析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人，鲁迅也把瞿秋白看作自己的“知己”，自己的挚友。

姚文元《论知音》见《细流集》第126页

瞿秋白的论文，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和他杂文的革命意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总结，粉碎了各种贬低、攻击鲁迅杂文的谬论。

姚文元《序论——伟大的时代产生了伟大的鲁迅》见《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第5页

鲁迅还有不少揭露胡适无耻面目的杂文。瞿秋白也写过“王道诗话”等犀利地批判胡适的杂文。鲁迅和瞿秋白对胡适的斗争，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姚文元《鲁迅对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和反动文艺的批判》见《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第73页

《保卫延安》中成功地描写了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彭德怀将军，……从彭总卓越的指挥艺术中，我们看见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把人民解放战争引向胜利。

姚文元《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10月出版

小说中生动地写出了彭德怀将军的性格特点和 精神面貌。彭总的特点是极其沉着、镇定、冷静。通过反复的侦察和深刻的思索，他对敌我情况了如指掌，能在似乎是最危急

的时候掌握住战争的主动权，把敌人引向灭亡。……彭总的判断是明晰简单的，只有几句话，但包括了一切最根本的东西。

(同上)

彭总和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有这个特点。他好象掌握了启发人思想的钥匙，很简单的几句话，便会使你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明朗，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清楚。

(同上)

彭总不但是一个天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小说中描写了彭总的和蔼严肃、平易近人的作风，描写了彭总身上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精神力量。……我们感到彭总纯洁的党性，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的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在战略上根本蔑视敌人，有毫不动摇的胜利的信心；在具体的战斗中又非常周密地一丝不苟地检查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置敌人于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

(同上)

现在彭总正屹然站在世界地图旁边，严密地注视着帝国主义的动静……

(同上)

李秀成《再致上海各国领事书》中，揭露了帝国主义无耻的虚伪欺骗手段，原来“同事上帝、同信救主”的“贵国”，竟毫不重“信义”，“首先违背约言”、大搞侵略阴谋。

姚文元《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育人民》

见《新松集》第341页

（五）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对于爱情也是一样。自私的人是得不到持久的爱情的，只有热爱祖国、热爱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得到持久的爱，只有把自己的双臂紧紧地拥抱全人类的人，才能永久地紧紧和爱人拥抱！

姚文元《幸福和享受》见《在革命的烈火中》

第6页

爱情的坚贞不移是经过任何巨大的变化都永远不动摇的，天地的悬殊同爱情的永恒恰相对照，“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有力地表达出这种天上地下永远不变的深情。

姚文元《论对句》见《文艺月报》1956年第12

期第43页

……只要把“你爱我，我爱你”写出来就是好诗……结果，不少爱情诗缺少思想意义。也缺少深厚的艺术上的感动力量，不能象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描写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等）那样，通过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描写概括了深广的社会内容，歌颂了人民对爱情的坚贞，又批判了生活中丑恶的事物和感情。

姚文元《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见《文艺

思想论争集》第14页

（六）吹捧《水浒》，美化投降派

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同这首诗（指：李绅的悯农诗）同样优秀的好诗。但为什么只有这首诗才有被社会主义国家的

店员贴在墙上的光荣呢？因为它直接地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农民劳动的辛苦，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只知浪费挥霍不知农民生产是多么艰苦的人。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类的文明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所以歌颂劳动的优秀的诗，对于轻视劳动的人，就是一种教育。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

姚文元《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见《冲霄集》第101—102页

但闻“历代”农民革命家从《水浒》中得到鼓舞，民族爱国志士从岳飞、文天祥的诗中得到启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志士”曾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库去“寻求光明和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的无产阶级战士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找到最“巨大鼓舞力量”；从未闻有高呼“春蚕到死丝方尽”去抗击侵略者的“爱国志士”，也未闻有长吟“蜡炬成灰泪始干”而慷慨就义的“民主志士”。

姚文元《奇解一则》见《文汇报》1963年6月7日

《水浒》、《三国》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

姚文元《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见《上海文学》1961年第11期第56页

过去古典作家——伟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在创作时是凭借了朴素的唯物论——反映论的，他们忠于现实，努力的如实的去反映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历史的本质，揭露了旧社会中一切腐朽性及其溃败的命运。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凭借朴素的唯物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因此，那些伟大作家的著作中就不可能真正的指出历史发展的道路，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新生力量，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而且许多作家还经常承受他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时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这种矛盾归根结蒂限制了甚至损害了作品的内容。果戈里在创作新人时的失败，曹雪芹在贾宝玉的性格上、出路上的某些虚无主义思想影响，水浒传的英雄们终于接受了“招安”，都是说明了这种矛盾。

姚文元《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见
《解放日报》1955年3月15日

……我们看到很多伟大作品，并不是什么“正总是压倒了邪”、“善总是战胜了恶”，恰恰相反，很多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品结局都是邪压倒了正，恶战胜了善。——正是这种结局激起了人民对于反动的剥削制度的痛恨。《红楼梦》是一个悲剧，《水浒》也是一个悲剧，屈原的《离骚》是一曲凄怆的充满悲愤同怨恨的高歌。“善总是战胜了恶”——这在过去历史上只有在革命时代才发生的！“好人”“坏人”也不能包括复杂的社会各阶级同各阶层的人群，——你能把秦始皇简单地归进“好人”或“坏人”中去吗？你能把周瑜划入“坏人”一类或者把孙权划入“好人”一类吗？

姚文元《评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见
《文艺思想论争集》第304页

(七) 胡说《红楼梦》是“多角恋爱”小说，曹雪芹观察生活用的是贾宝玉的眼睛

社会主义的文学也需要历史题材的作品，但决不会幻想在描写新生活的作品中去复活那早已逝去的旧时代的美，如有的人以“红楼梦”的伟大为例，津津乐道地幻想创造出一部同革命斗争无关、专写一群人多角恋爱悲欢离合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红楼梦”。“红楼梦”这样内容、这样题材的伟大作品是决不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出现了，正如古代的、人类童年时期的美不会再在新的生活中再出现一样。

姚文元《再谈教条和原则》见《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194页

曹雪芹是用贾宝玉、林黛玉的眼睛去观察大观园的人物和是非的，他创造出了一幅异常真实的社会图画，如果他是用贾母或宝钗的眼睛去观察大观园的人物和是非，宝玉就会被写成真正的呆子，黛玉就会被写成尖酸刻薄寡廉鲜耻的“荡女”了。

姚文元《再谈教条和原则》见《文艺思想论争集》第41页

(八) 尊孔崇儒

好学，在我国是有传统的。“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道出了一条知识积累、变革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到现在我们还常引用它来说明继承和革命的关系。

姚文元《漫谈读书》见《冲霄集》第71页

……孔子所提出的“仁”，虽然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它并不是以否定一切等级制度，主张权利平等为前提，恰恰相反，孔子提出的“仁”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等级制度，巩固“不平等”的制度。……钱谷融把孔子列为古代东方“人道主义精神”的代表，大概是因为孔子主张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但这个“恕”同他提倡的对于封建制度的“忠”是统一的。“恕”正是为了使封建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斗争，不复仇，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这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所以孔子竭力主张“正名”——每个封建阶梯中的人都自觉地安守自己的地位，不作违反自己等级的任何行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这就表现了他的基本思想。……

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积极作用，他的学说中有值得批判地吸收的东西

姚文元《评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见
《文艺思想论争集》第299页

古人很懂得艺术形象具有理论思维所不同的感染力，强调要充分利用文艺的作用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在封建阶级上升时期，他们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明确地表示过文艺的教育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封建社会中历代先进的诗人，许多人都把这段话作为坚持诗的社会作用的名言，来对否认文学的社会作用，教育作用的理论相对立。

……

姚文元《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见《上海文学》1961年第11期第52页

建安七子中的孔融，当时是很有才气的，但因为他的言论对曹操不利，于是曹操找一个借口就把他杀掉了。

姚文元《驳施蛰存的谬论》见《在革命的烈火中》第142页

然而对于劳动人民，堂鼓起的“伸冤”的作用却极微极微，只有偶尔碰见一个清官时才能起一点作用。

姚文元《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见《在革命的烈火中》第133页

（九）鼓吹修正主义的“题材无差别论”

我们要反对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只要真正有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可以写工农兵也可以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材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遥远的过去，而且同样可以写出非常优秀的作品。

姚文元《再谈教条和原则》见《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33页

直接服务的作品和间接服务的作品，我们都需要。我们既需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密切配合一定阶段的政治任务的作品，也需要广泛地反映历史上各个时期各方面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面应当很广阔，不是很狭窄；文学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应当很丰富，不是很枯燥；文学作品的风格和样式应当很多样，不是很单调。多样性是文学特点之一，片面地否认这种多样性，以一种样式来代替其它样式，不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所以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

姚文元《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见《冲霄集》第151页

音韵部(十) 鼓吹修正主义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论

我认为在学术问题面前，不管党内、党外、老辈、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只能“以理服人”，各种见解应毫无保留地尖锐地展开争论，任何人都没有特权阻碍别人发表意见。

姚文元《和徐中玉先生商榷几个问题》见《解放日报》1956年7月15日

其实呢，学术问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姚文元《何必害怕》见《兴灭集》第131页

意思部(十一)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鼓吹剥削阶级的个人奋斗

现在引用“锥刺股”来勉励青年发奋读书发奋学习的文章，已经看见不止一篇了。历代有很多极为刻苦的读书人，他们苦学的精神，是值得今天青年借鉴的。

姚文元《关于“锥刺股”》见《想起了国歌》第98页

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生活、读书、写作，把底子搞得扎实些，努力地自觉地去补足自己所不足的东西（每个人不足的东西都会有所差别的）。从复杂的生活中去体验，从古典作家作品中摸索，从自己成功与失败的作品中摸索，把眼光放远，把思想水平提高，不是以一个月两个月作衡量自己的尺度，而是以一年两年乃至十年八年作为衡量自己的尺度，不赶什么“干预生活”之类的时髦，不走捷径，不随风倒，受得起别人这样那样的怪话，坚定地、扎实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这是很艰苦的，甚至会受到某些赶时髦的人的责

骂，但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学上走出自己的路。每一个大作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姚文元《关于青年的杂感》见《在革命的烈火中》第78页

次要的文意另见袁次可《社会主义的三怪圈》

(附中央)

据文，文风有直豪粗莽。党共富强，言直表突如于董毅。
火感出受党共并
强，盟同大由自益炎春平。三武一干，半楚冷平下善融
气共血参，盟邦案非舞依固中融安有相同。委此成表婚明
会员委前面亦工兼共，以脂卷总升兼委此成表婚明式治，设
麻委常绘总会武能艺文平青兼同同，因崇做冬共同同，良蔡
总兼委此盟期日批帝又果出文升，不委事八一武。又都梁墨
单共，春平二三武一。研件国英兼共外新讯报国司，牙看卷
来平即。重安的非西至央中升平三三武一。群且零文得踪查
编志察察兼且学文，半非，高半学文，由新尔巴，表黄拜说
委

研式照平青由要法

着烈烈个勤，筑值前替交出个时奈寒，即察时潮眼系前
因味音主人个悔想，因书险想，同苦度潮，里表者前共射亦
不器大，的11年个情血烈升升国大数最排，湖出天海翁前刺
个一前射以量野与自奔，影重和染纸可不洞
英前会并四巴因，音又主到眼面诗烈遇个一景处前平十
画。在日的非要指不表曾的影对排一高，排美新式群报户公
烈研几排，变高研并致由数想入个千山，变意前气如七由最

新大个一第。清南后自出武上學文造韻本。科故存以册。要
出来抵去科茲長請。家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回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努力

(中央社讯)

姚蓬子顷发表宣言，脱离共党。兹照录宣言原文、及姚在共党经历如次：

姚蓬子本名梦生，于一九三〇年春发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选为执委，同时并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共产党，在左联被选为执委兼任总务部长，并兼工农通信委员会委员，同时并参加党团，同时兼青年文艺研究会总会常委和组织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执委兼总务部长，后任组用部长并兼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春，并负责编辑文学月报。一九三三年任中央至河北的交通。四年来历任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编委。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在这黑暗和黎明、衰老和少壮交替的前夜，整个民族落在挣扎的苦难里，感到苦闷，感到彷徨，感到个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无出路，将是这大时代的热血的少年们的一大部分所不可避免的遭遇，我自己便是这样的一个。

十年前我是一个极感伤的颓废主义者，以当时社会的灰色气氛作为滋养料，在一种忧郁的情绪下消度我的日子。可是由于时代的激变，由于个人思想的成长和演变，沉默和叹

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恼，于是开始在愤激的热情下，转换我的人生观。我要在一种理想当中，取得我生命的开展和寄托，于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个左翼文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

从一九三〇年到今日，我曾作为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及党团）、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发起人并负责党团书记、以及萌芽、巴尔的山、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左翼杂志的编委。到今天止，我将我个人整个的精力，完全贡献于左翼文化的祭坛之前。

同时我曾企图以脱胎换骨的努力，在实生活中检查自己，监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仅成为个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识上新生自己，成为一个典型的布尔塞维克。

可是事实上没有走通这一条新的路。在长期离社会的生活中，在工作的困难和停顿中，时常引起一种新的厌倦的情绪。虽然我竭力严厉的裁制着自己，认为是发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而加以咀咒仇视，可是我无法绝灭这一厌倦的细菌的滋长。

现在是我结束过去的生活、开始未来新生的时候。从改换政治立场的长久的反省中，我发现并理性的确定这一厌倦的来源，不是我过去政治的不坚定，而是由于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因此作为共产党的组织细胞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是一个良心的共产党员，必然会涌起一种虽说是说不出的茫然的、可是无限痛苦的苦闷。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

深刻的理解了共产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因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对外是脱离帝国主义的铁链，以保障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对内是肃清封建残余和军阀遗孽，以统一中国、以达到真正的和平，同时发展都市的民族工业，解除农村的封建剥削，给予广大劳苦群众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以这些任务的达到与否，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先决条件，则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显然不为中国当前之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直接的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将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减少到零度，结果客观上事实上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所以无怪乎一个原则上本该建筑于广大群众的基石上的党，结果却停留在一种秘密结社的狭隘的状态中，而它的政治行为，非但不能给予群众以深刻的良好影响，引起他们热烈的拥护、欢迎和参加，相反的反而使人起了一种谈虎色变的恐怖观念。

这样在政治上已经失败了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反映于文化上的失败是怎样的碰壁呢？

自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跟着一九三〇年的疯狂的立三路线，飙起了一个极盛时代以后，即趋向于脱离群众的衰落状态中的左翼文化运动中间，虽后经过共产主义的作家们多次集体的努力，到今天事实依旧证明无法以无产阶级作品本身，来争取和组织广大的知识青年。所谓现阶段的列宁主义作品的产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辞而已。这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一般的苦闷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是一个民族的死亡和复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利害问题。所以作为教化的武器的文学，应

该是为了民族的生死战斗，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一阶级的前途。而且从没落的旧贵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们，我们自己问问，当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本意，是为了遏制不住火一样强烈的阶级的仇恨心，还是为了目睹和身受这民族的危机呢？以一个从苦难的民族的挣扎里产出来的作家，而企图创造理想的无产阶级作品，结果自然没有一个不遭到可悲惨的失败。其中有几部为青年所欢迎所爱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则都是含有针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一些病状的意义，超过它为阶级服务的意义的。然而这些作品又正是共产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尺所认为右倾的、含有毒素的。正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一样，左翼的文化运动之陷于失败而趋于没落，是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原因的。针对着中国今天的现状，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对比之下，我在郑重的考虑之后，得到了如上的结论。因此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并将此种微意，敬献于青年的朋友们之前。姚蓬子押，四月十八日。

〔中央日报(南京)1934年5月14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还“四人帮”以老右派的本来面目

作者=山东省革委文化局创作办公室编

页数=173

SS号=12495959

DX号=

出版日期=1977.04

出版社=

封面

前言

目录

三月的租界&鲁迅

鲁迅批判张春桥之流的言论选辑

批判张春桥

揭开狄克们的反革命嘴脸——重读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石冶弓

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
从《俺们的春天》看张春桥的反动嘴脸&文汾

平

张春桥是蒋介石的吹鼓手&卫今

一个日本走狗的供状——评张春桥的反动文章
《济南》&山东大学大批判组

一个老反革命的自供状——评张春桥三十年代
中期的黑作品&吉林省图书馆大批判组

批判江青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鲁迅研究室
从争演赛金花到为蒋介石祝寿——揭开老投降
派江青的真面目&文物出版社批判组

最无耻的汉奸理论——斥江青一九三七年的黑
文《三八妇女节》&立军 泽清

批判姚文元

姚文元是个尊孔派&邢福石

褪其华裘 示人本相——评姚文元的尊孔言论
及其它&柯文平

附录

张春桥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俺们的春天

济南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张春桥向鲁迅反扑的信

也是文学管见

纪念九一八

韩复榘

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

坚持工农兵方向

把根扎深一些

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

张春桥其它文章中的反动言论摘录

江青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演员独白（节录）

为自由而战牺牲

三八妇女节

“四十年代”与“业余剧人”争演赛金花
纠纷的经过“业余”招待记者解释一切

么哥：见闻偶记——蓝苹将演赛金花

蓝苹一九三六年参加为蒋介石“购机祝寿”
演出的情况（资料）

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漫谈“同”与“异”

一点补充

教条和原则（之二）

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姚文元其它文章中的反动言论分类摘录（共十一类）

蒋帮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所载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封底